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6年第4期
总第(374)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16年2月29日

目 录

教育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	
——兼议当前的大数据热潮.....	阎光才 (02)
利弊之间：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反思.....	傅淳华 杜时忠 (08)
批判话语分析在大学章程文本中的应用研究	
——以新加坡国立大学章程为例.....	张奂奂 高益民 (14)
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定量分析	
——以政策工具为视角.....	李科利 梁丽芝 (20)
中国留美大学生学业和文化适应性问题研究	
——以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为例.....	董庆文 陈 迅 (28)

编者的话：研究范式的产生是一门学科达到成熟的标志，研究范式对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起着规定作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反映了知识生产的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研究方法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学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研究方法的选择既是做学问、写论文的第一步，也是探讨教育学学科属性，促进教育学走向科学研究的重要一步。研究方法的使用要服务于研究问题与研究内容，围绕问题展开研究并非是某一种方法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根据需要进行不同方法的混合与融通。本刊以“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为选题，选编若干文章，供读者参阅。

主 编：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范笑仙 责任编辑：聂文静 李 璐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教仪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 编：100082 电 话：(010) 59893297
电子信箱：gaoyanbianjibu@163.com
网 址：www.hie.edu.cn（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观点栏目）

教育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

——兼议当前的大数据热潮

阎光才

近来，大数据的概念风行世界。在“时间就是金钱”“信息就是财富”“知识就是生产力”等一波波浪潮过后，“大数据”成为又一个吸引眼球的概念。不知道这个概念的风行是否也会如以往情形，潮头过后，这世界依旧如退潮之后的滩涂，难寻遗踪。不过，对于传统自然科学包括大部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研究者而言，重数据的意识其来有自，其区别仅在于“大”与“小”之分。本文尝试结合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对数据以及所谓的大数据在研究中的意义、价值和问题，提供些许分析与思考。

一、数据与真实的世界

提及“数据”，自然不能回避什么是“数”或“数字”。其实，数字与文字一样，就其文化起源而言，都源于早期人类的记录或记载的需要，甚至两者的功能曾一度混淆。如在尚无文字的我国上古时期，有所谓“结绳记事”一说，结绳者，“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古印加人神秘的奇谱也是“结绳记事”的一种形式，其中的绳结既用来计数又属于一种会意文字。因此，在发生学意义上，最早的数便是文字，也可以说文字就是数，它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一种作为记载或标识的符号，因为具有文字表意功能，所以既不抽象也不神秘，而是生动和具象的。数在人类历史上功能被放大的过程与其自身不断的抽象化相伴而行，这个抽象化过程展开的重要初始节点很可能是数字与文字的分离。我们虽然不知道这种分离发生于何时、为何和如何发生，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此之后，数字与人类感官所触及的经验或现实世界逐渐失去了直接关联。正如赫弗德（J R Hurford）所言：“一般说来，数词明显是种神秘的、不规则的语言，因为它所表示的那些数目，并不像其他语言表示人、位置、事务、行为、状况和性质这样实际存在的东西。”

然而，数字虽然无其具体的所指，是一种纯粹由人的心灵和精神所建构的抽象符号，却并不意味

着它远离我们日常的经验世界。恰恰相反，抽象化不仅赋予数字越来越广泛和普遍的功用价值，如土地丈量、远洋航海、农时划分、货币交易、建筑设计等等，而且数字还越来越成为人类破解外在世界符咒最为可靠的工具。甚而至于，相对于文字所能够描述和呈现的世界影像——一个总处于流变之中且叵测的感官世界，正是数字化的呈现给人以世界的和谐、确定和秩序感，让人类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到了一丝终极意义上的慰藉与安全感。如常言说的一切皆有“定数”、中国传统的易经八卦、西方早期的占星术、毕达哥拉斯“一切皆数”的本体论主张以及牛顿“整个宇宙就是一口精确时钟”的机械论信念等等，无论你认为它们是荒谬绝伦还是精准可靠，这种以数为依据的阐释或解释一度成为人们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的心灵皈依。即使在一个所谓反思量化科学的后现代时代，数字的这一价值不仅没有贬损，反而借助高度发达的数据技术进一步增值，时下的大数据热便足可作为佐证。

可以说，没有数与逻辑这种纯粹人类理性的建构物，就不会有后来越发精致化的科学和技术，恐怕也不会有今天人类物质丰裕的社会。如果没有数字与文字的功能分离，一个仅有语言的人类世界或许与其他动物的世界并无二致。正是有了数字才使人类理性之光得以充分展现，把人的理性、智慧发挥到极致。尽管我们不敢妄言，人类是否通过数字识破了自在世界的神秘代码和秩序，但至少可以确认的是：人类已经通过数字精心建构了一个人工世界，我们生活于其间，甚至已经无法辨清它与自在世界之间的区分。更意味深长的是，数字原本作为人类探求和掌控自在世界秩序的工具，它所塑造的是一个人工世界或者是贝克（Ulrich Beck）所谓的“人造自然”、吉登斯所谓的“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其不确定性或“风险”反而日益剧增，数字反过来又成为应付它自身不确定性的工具。大数据概念的提出，与其说是对当下社会“信息爆炸”

和“技术革命”的顺合与适应，不如说是对人类当下所生活的人工世界更具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生态的一种自觉反应。

人类期望以数字来寻求确定性，而由数字所演绎生成的知识、技术和社会系统又进一步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于是，人们再次对大数据寄予厚望。这一链式循环过程多少有些西西弗斯式的悲壮色彩，而且也有左右互搏的荒诞和反讽意味。

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与知识

教育学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人学？这恐怕是一个永远也阐释不清楚的问题，因为两者在根本上表现为立场之间的差异，而且两种取向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各说各话，难得有实质意义上的交流，更遑论融通。教育研究取向和立场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对教育日常世界的理解和预设不同。前者倾向于把教育日常世界理解为一个理性行动者主导、充满客观事实与事件而且不同事实和事件背后都存在一种因果关联或至少存在相关性的场景；后者则更多偏向于把教育世界理解为一个与特定历史、文化、政治存在情境关联且充满群体甚至个体间种种价值纷争和冲突的场域。两种预设又决定各自的研究取向和知识旨趣不同，社会科学取向更偏爱客观理论解释与知识建构，后者则执着于终极价值关怀、意义与文化诠释以及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

相对而言，偏爱数据是社会科学取向之教育研究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科学主流研究范式的影响下，与质性研究兴起的情形相仿，实证意义的定量研究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开始呈勃兴之势，这种被称为规范化的研究无疑是对我国重逻辑思辨研究传统这一缺陷的弥补。但是，究竟如何理解教育研究中的数据？由数据所演绎和生成的教育知识是否就具有超越特定情境的客观性品质，即反映为所谓教育活动和世界中的秩序或规律（law）？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后结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思潮的涤荡下，即使再严格和规范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估计都不再敢于自信满满地视数据分析为洞穿事物本质、反映世界规律以及获得确定性客观知识的利器；更何况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原本就对经验世界中众多事件背后存在的因果关联持怀疑态度，因为社会科学领域立足数据的因果分析

所采用的多为统计模型。正如彭玉生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的统计模型对经验世界的解释充其量是其中的一部分，如对个人行为解释的线性模型中， R^2 一般不超过 50%，而剩下的则被作为不可解释的部分纳入随机残余项。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科学，包括宏观历史研究，基本上放弃了决定论，即便是最完美的理论也不能排除偶然因素造成的误差，并且人类认识能力有限，理论本身还有谬误”。严格说来，在此所谓的“偶然”因素，说是偶然，还真未必就是那么“偶然”，它恰恰可能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本质”。这种不确定性既在“数据”之中更在数据之外。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数据的来源通常有两类。一类是所谓的“客观数据”，譬如教育研究中的入学率、受教育年限、学业成绩等等。社会科学中许多严格的理论模型往往是以这些客观数据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布劳和邓肯通过建立起一个简单的包括先赋性（父亲职业地位与教育程度）和后致性（本人教育程度、初职地位和现职地位）变量的模型，解释了后致性因素在子女社会地位获得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然而，这种基于几个简单客观数据建立起来的模型并不完美，因为代际间的流动涉及太多可能存在潜在影响的变量，譬如个体或群体成长环境、个人其他因素、性别和族裔、所接受教育的质量差异、关系网络和各种其他社会资本等等。故而，该模型随后不断受到各种挑战和修正。然而，即便如此，无论加入多少变量和如何复杂改造后的模型都存在缺陷。首先是数据内涵的复杂性，如受教育年限不等于所接受的教育品质，即使可以设计一个测量品质的量表，还存在个体接受教育学校、等级、类型和专业等等差异。此外，教育年限与品质也未必能够反映个人的智力尤其是非智力性因素。至于环境变量则更为复杂，出生年代不同，整体教育资源稀缺程度存在差异，个人成长的社区（村镇）环境千差万别也是一个复杂的干扰因素，更难以测量的是数据之外的一些偶然性因素，如成长中的贵人和“偶遇”（社会网更多关注的是密度和结构洞），如此等等。

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类数据来源为主观数据或

者主观信息，多以调查工具的方式获得。譬如，在教育研究中，了解众多关于师生的学习和工作压力、就读体验和职业感受等信息就属于该类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幸福感调查。主观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以及模型建构的基本预设是：尽管获得的信息带有个体主观评价色彩，但是，当众多个体信息汇集在一起，结果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它就反映了一种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状态，这一过程被称为主观信息（事实）的客观化。主观数据客观化过程，其实也是研究者对存在统计意义相关（在经验世界中未必存在真实相关）的不同数据之间尝试展开逻辑建构的一个过程。从主观数据到主观的逻辑建构乃至解释模型的形成，整个过程其实都渗透着乃至注满了人的意志。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认为：因为现实的经验世界中，人的行为动机和后果原本就存在难以理解更遑论精确把握的不确定性，主观数据分析的目的无非是试图在看似无序的世界中捕捉和缕出其中的头绪，并提供合乎逻辑而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的解释。相对于所谓客观数据，基于个体主观感受的数据实际上更具有情随境迁的可变性。换言之，即使主观数据确实能够反映当下状态，理论解释模型也成立，但它恐怕仅具有当下的合宜性，即存在特定情境关联。脱离这种情境，主观数据不仅会发生变化，理论解释模型也难以成立。甚至在不同时期主观数据大致相似的前提下，理论解释模型也存在重大缺陷。例如，以高等教育公平主题为例，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环境中，入学机会的多寡可以构成人们公平感受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入学质量为潜在影响变量，但是在入学率大幅提高的前提下，人们的公平感受未必会提高甚至有可能降低，原因在于入学质量可能成为更具显著性的影响变量。

总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即使在能够保证数据和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而通常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无论基于客观数据、主观数据还是兼顾两者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或许对经验世界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因为存在无法穷尽的解释残余以及经验世界本身所存在的流变性，以数据为基础的理论并不是确定性的知识，而且极有可能存在一个悖论——一个即使有强解释力的理论模型一旦为决

策者所认同，基于该模型的政策手段介入往往又会带来经验世界的改变（包括微观层面人的行为动机调整和宏观层面社会结构变迁），这也意味着理论模型反过来又可能构成本身解释力的一个干扰变量。上述教育公平以及人力资本理论在现实中就反映了这种尴尬：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环境中，无论在宏观还是个体层面，教育年限增加都会带来高回报，这符合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但是，一旦人力资本理论成为政策依据，在政策推动下，当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后，教育年限与回报之间就并非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就会出现问題。

当然，如果我们再较真下去就会发现，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人造自然或人化世界，其基于数据的理论模型建构，恰恰与制度和文化所形构或塑就的秩序存在密切关联。甚或不妨说，正是因为存在道德、法律、金融制度、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作为迪尔凯姆意义上“将自己强加于每个人之上”“如此普遍”的“社会事实”存在，才使得以探究秩序为偏好的社会科学理论模型建构成为可能。然而，在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首先，不同于自然世界，制度和文化所体现的是一个人类共在的意义世界，数据充其量可以具有部分解释功能而无法提供意义诠释；其次，制度和文化会随“时”（历史）“空”（地理或族群）意义上的情境转换而变迁，这也意味着构成事实的数据不仅在“量”上将会是变动不居的，而且“质”的内涵不同；此外，因为数据解释的要么是迪尔凯姆集体意义上（或者技术上统计意义）的秩序，要么是类意义上“理性人”行动的相对一致性，而每一社会具体个体或群体与整体存在偏离或游离部分往往作为残余项被消解掉了。这也是基于数据所建构起来的理论模型频受争议之处，它或许有逻辑简洁之美，却并不能反映意义世界和自在世界的复杂生态。

三、数据分析与意义诠释

毫无疑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数据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性。相对于人文取向的研究，数据对状态及其变化趋势的呈现更为直观，不同数据间的统计相关为人们合乎逻辑地推断和求证社会现象背后或许存在的关系（未必完全是因果关联）提供了可

能。但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数据分析结论的可靠性端赖于统计分析方法、技术和工具使用的妥当性以及理论逻辑推演的严密性，然而，如果仅止于此，就有可能陷入形式主义、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陷阱。其实，所谓严格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并非仅仅指涉实证研究所要遵循的一系列如确定问题、文献、理论假设、抽样、测量、数据分析和结论等等刻板化程序和形式，即彭玉生所言的“洋八股”。规范固然有其必要的形式化要求，但形式总是要为内容服务。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作为一种符号表达形式，源于经验世界而且是对经验世界丰富多样内涵的高度抽象和一般化。既然它是对经验世界的抽象，就涉及一个基本的前提：我们是如何把经验世界数据化的？数据的内涵乃至基于数据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背后的因果关联机制推断和分析，是否仅仅就是一个理性的逻辑推演过程而与意义诠释无关？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实证性研究中，研究问题的确定本身就来自人的意向性，即人们对所生活经验世界的困顿或者某种情感、价值偏好，围绕问题的变量关系确定以及变量的测定、数据的生成等本身都灌注着人们对自我生活世界的理解。以学生学业成绩差异的社会背景的关联为例，如何理解和界定“学业成绩”？以分数来界定的成绩究竟反映的是认知能力还是精英权力？什么是学生的社会背景，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网络关系的？这些变量如何测定？还有，为何要研究上述两者间的关联？显然，如果没有研究者对生活世界的体验、关切、理解和自我偏好甚至价值“偏见”在先，数据的生成和获取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使用的各种概念，如信任、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网络资源、地位、权力等等，在其作为可操作性定义并被纳入具体测量过程之前，如果研究者不结合对特定社会情境和日常生活中与他者共在的体验，辅之以经验观察，就根本不可能生成可以纳入实证研究的有价值数据。

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实际上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单纯的抽象符号。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社会科学或教育研究者而言，没有一种对特定历史和文化境遇中“他者”的深度理解，数据之于他就如

同一枚古钱币，仅识得其数字意义上的币值而全然不知其历史与考古价值。即使他具备理论的敏感，善于以经验观察者的身份去捕捉和把握不同社会事件间在数据上的关联性，但如果缺乏对社会事件背后及其背景中人的意图、动机、情感和行动意义的深层体验和文化觉悟，无论其数据分析的逻辑如何严谨，理论的建构如何精致，也不过是希尔德布兰德（David K. Hildebrand）等人所提到的那种自信满满的“社会统计学家”——“一无所有的经验主义”和“没有头脑的计数器”。

在现实的教育研究领域，这种现象并不乏见。譬如为了实现学术的“国际接轨”，符合“洋八股”的形式规范，也为了迎合时下正在显现的一种“证据文化”趣味，各种缺乏意义深度诠释的数据分析文本日益流行。各种国外调查工具和量表的直接转译和应用、为验证基于国外社会情境所生成的有关理论解释而选择和过滤数据等，就是缺乏本土意义深度文化诠释的表现。当然，还存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形：很多所谓实证意义上研究基本就是对数据差异、相关和回归等分析结果的呈现和简单武断的结论，因为缺乏对数据的丰富内涵的理解，对于各种统计模型中各种变量关系间所存在机制的解释往往显得极为苍白。

总之，即使是基于数据的研究，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对自己所生活的周遭世界基于共同历史与文化体验的深度诠释能力，需要具有经验观察的洞察力和理论建构能力。唯有如此，所谓工具的开发、数据的获取及其统计分析和解释才能服务于内容，而不仅仅为徒有形式的“没有头脑的计数”。不止于此，也唯有灌注着意义诠释的数据分析和文本呈现才不会让人对数据有排斥感，对文本有一种洋八股的疏远感和隔膜感，而是结合自我生活体验和体悟与数据、文本之间形成互动，在体味到一种亲近感的同时又感受到逻辑的魅力。有品味（即有历史和文化厚重）、有亲切感（即与他者日常世界经验共通）、有智慧（合乎逻辑的理性推演）、有规范（符合专业研究的规范）原本应该是基于数据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品质，是否具有理论解释力不在于其高度抽象化的形式，也不在于小圈子里的认可，而是对每一生活在特定世界中有着集体生活经验和

常识的个体所带来的思想、精神和智慧的震撼。在对洋八股的简单形式模仿中，目前我们的社会科学似乎淡忘了这一点，甚至出现以形式的刻板、数据统计分析的复杂化来标榜自己的研究“正统”“规范”“科学”“入流”和“国际范式”的标准。

四、大数据与技术至上主义的自负

无论统计技术取得如何进展，数据之于社会科学与数据之于自然科学，似乎永远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对于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者而言，精确的自然科学也未必那么靠谱，但至少它基于数据演绎而对大多（并非全部）自然现象所做出的预测及其在技术领域所提供的功用价值，能够让人感到基本可信和可靠。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最偏好于数理分析的经济和金融等学科，恐怕也不敢妄言它对于现实的理论解释与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否则，人类就不会不断面对如此之多波云诡谲的风险和危机。而意味深长的是，大凡社会中某一领域越是具有不确定性，人类对这种不确定性越是感到恐惧，就越寄望于以数据来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秩序。这种对数理分析科学的精神与心理需求，其实与早期人类对占星术和卜筮的倚赖别无二致。

当然，对于基于数据分析的社会科学理论模型可预测性的低水平，不能作为我们否定其科学性的依据。假设在来源可靠的前提下，因为数据本身就是对经验世界的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状描和呈现，所以社会科学中的描述性分析过程及其结论至少具备部分的客观性。然而，如果仅止于此，就如同物理世界中科学家仅仅向你呈现一种特定物质的结构一样，它虽然可能具有“发现”的意义，但是还远未达到探究的理论建构目的。因为揭示一种结构形态生成的原因相对于状态的呈现更为根本，这就是所谓的为什么（why）或者“何以至此”的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常常让人感到底气不足。众所周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并不生成理论，唯有通过进一步的推断性分析才可能建立有关的统计模型或理论模型，揭示不同变量间的因果关联。如此，理论模型才有可能在共时性维度具有普遍解释力，在历时性维度具有可预测性。

如前文所述，因为存在不同社会和群体文化历

史境遇的独特性，在共时性维度，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理论模型都存在在外在效度的局限性，即使在同一境遇中不同个体日常生活体验的差异性也常常带来内在效度问题；而在历时性维度，因为理论的政策应用本身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干扰变量，且随时序变化而引起的境遇变迁、环境变量的复杂性增加，理论模型的可预测水平不仅大打折扣，甚至完全不适用。也许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似乎永远无法摆脱的困境和尴尬，靠信息技术起家的“大数据时代”提倡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带着掌控大数据技术的自信，对传统基于数据的社会科学研究干脆予以全面的颠覆。在他看来，因为技术已经为大数据的产生和获得创造了条件，从此“一切皆可量化”，“世间万物皆可数据化”；因为有了大数据，从此不需要假设和理论推断，不需要了解为什么而仅仅了解是什么（what）就够了，社会科学研究始终执着的因果关系再无探究必要，而只要知道相关关系就足够，数据会自己“发声”，它会告诉你“明天会做什么”。他甚至断言专家（即社会科学家）将会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数据科学家。

维克托的自信源于当代网络信息流动日益庞大的规模和计算机数据处理的超强能力，在其大数据技术主导一切的理念中，个体甚至传统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小样本都可以成为无关紧要的存在。换言之，如果说小数据的社会科学为满足研究的科学化和普遍性理论建构需要而舍弃了对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关注，那么大数据所倚重的云计算技术甚至对理论建构都毫无兴趣，因为它而言，一切包括个体和群体的存在意义和行为取向不过都是 PB 甚至 ZB 级别数据洪流中的 Byte 片段，它本身已经毫无价值，既然传统理论模型存在许多局限性甚至被认为“都是错误”的，那么不如将其抛弃。因为“PB 级数据使我们可以做到没有模型和假设就可以分析数据。将数据丢进巨大的计算机群中，只要有相互关系的数据，统计分析算法可以发现过去的科学方法发现不了的新模式、新知识甚至新规律”。概言之，在极端的大数据倡导者看来，技术比理论甚至比“人”更可靠、更能预见未来。

“技术主导、数据为王”的大数据时代，是否

将在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认知的研究范式”，即一种“代表着全新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基础，依据截然不同的操作方法，它将重组探索世界的学科分布，从而成为人类继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计算机仿真研究之后的第四种探索世界的研究范式”？目前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很值得人们疑虑。首先，假设数据和技术真正实现了突破，大数据成为一种有效的预测和掌控人类集体行为取向的工具，这种情形的出现究竟是人类之幸还是人类之悲？人类从远古蛮荒一路走到今天，恰恰是因为跌宕起伏的不确定性存在，才有了曲曲折折、千变万化的样态和生态，有效的预测技术往往会转化为一种社会管控技术，这种技术对人的自由和创造力会带来什么效应？其次，反过来看，以物质世界为对象的精致性和精确化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在为人类社会塑造了一个“人造自然”的同时，不确定性和风险不减反增，而一旦在社会科学领域，大数据的可预测性成真，它是否会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第三，当个体生活经验和意义完全为数据洪流所湮没，甚至逻辑推断和理论模型建构被抛弃，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可能不仅让我们再也无法体会个体和特定群体生活经验的生动和鲜活，而且让求知过程的知识旨趣和智慧之美就此消散，如此社会科学研究恐怕仅仅成为满足政策和商业“功用”的工具，研究是否还有其精神意义和价值？更何况，当数据的获取和处理都丢给了计算机，数据和技术自己会“说话”，那么人又在哪里？

有着丰富信息技术领域从业经历的涂子沛在其文采斐然且极有影响的畅销书《大数据》封面上，印上了醒目的宣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这一宣言与传统实证主义者的“用事实与逻辑说话”的声称不仅何其相似，而且还更为咄咄逼人，难免让人感到一种数据崇拜和数据迷信的意味。数据的确有其价值，但巨量的数据流恐怕不能替代和置换由具体个体所构成的生活世界。

反过来说，假如我们的确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一个大数时代，那么，与历史曾经出现的资本、技术、能源、信息和知识等一波波社会革命情形相仿，谁

最有可能获得和控制大数据，并把大数据作为一种不当操控手段？正如博利埃（David Bollier）指出：“大数据会给政府和公民带来许多可怕的挑战，因为数据技术越来越具有渗透性、侵入性，越来越难以理解，我们的社会如何能够保护自身，抵制有些人对大数据的误用和滥用？我们要通过建立什么样的规制体系、隐私法和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才能够控制由它引起的反社会行为？”大数据面前是否存在分享的民主和平等？谁将从中受益？它是否会让这个世界因为数据鸿沟的扩大而更为不公平？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会使人类世界呈现更为多样化的复杂生态还是趋向于归一化？所有这些问题表明，我们在对之抱以热望和翘首以待的同时，恐怕还需要保留一份谨慎。

在保持基本的理性和谨慎的同时，也许还值得我们报以乐观期待的是：大数据只不过是教育或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新的境遇和背景，它通过技术处理所直观呈现的结果（趋势或各种相关性）并非结论本身或者研究的终点，而是构成我们进一步探究诸如是什么、为什么和应该是（should be）等问题的经验素材，通过降噪、去冗和分类等处理环节，大数据可以还原为可揭示其因果关联机制的小数据，可以成为人类甚至个体去反思自身行为和意义的信号预警。这也意味着所谓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更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特征，需要技术专家、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者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因而更凸显其研究有品味、合乎专业规范、有亲切感、富于智慧性且有效用的多重特征。

（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4期）

利弊之间：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反思

傅淳华 杜时忠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取代君主和教士的位置，成为最受尊敬的人。据说，是因为他们是一切有益于生命、自由和追求财富之事的显而易见的来源。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已经代替了神，也代替了人，成为万物的尺度。而正是借助于“科学”的强势，现代社会中的教育科学研究也随之在教育领域中呼风唤雨。事实上，近代以来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也确实表明，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兴起对教育领域各方面的整体进步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有学者就指出，美国的教育系统日趋复杂并日益追求学生成绩的提高，而教育的科学研究对于改进这样的教育系统就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因为其在各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在当前的教育研究领域，“科学”二字往往成为各方争相攀附的对象。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以之为包装，便可挟“真理”以自重。而许多教育实践领域的教育工作者，也往往热衷于对自身进行形式多样、参差不齐的“科研包装”。但是，在当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盛名之下，许多人往往并没有意识到其在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同时，也会在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它们的发展。事实上，在当前的教育研究中，一些学者已对此问题有所反思，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自身所存在的方法论困境，其泛滥对于个体的自我理解乃至人类求知的危害，以及其本质上悖逆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等等。虽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人们关于现代教育科学研究方面认识的深化，但它们并没有立足于对教育科学研究本质的深入探询，结合其时代遭遇，揭示其对自身理应坚守的精神性诉求的抛弃，以致消弭了对真理的热切追求，而往往陷于功利性的桎梏不能自拔。由此，本文将就此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教育科学的历史考察

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都属于哲学、神学、神学化哲学的范畴，远未形成系统的教育学科知识。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段发展历程对于教育科学研究具有着重大

的、开创性的意义，例如，在苏格拉底（Socrates）那里，他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多以个人经验为基础运用观察、归纳、类比等方法，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科学的精神，对后世的教育科学研究有开启之功。而就其性质而言，散布于哲学研究之中的教育科学研究基本上是自由民、神职人员乃至贵族从事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动。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诉诸对哲学的起源和根源的考察来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就哲学的起源而言，它是公元前6世纪启蒙时代古希腊人探究精神的自然后果，即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不偏不倚地、没有成见地说明事物，不受通俗神话的影响，不为直接的实际需要所牵制。作为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为了追求真理，就向每一位愿意倾听并参与对话的人提出问题，通过理性的论辩来获得真理，而极少关注社会上的政治权利及经济地位等问题。

其次，就哲学的根源而言，根源不同于起源，起源具有着历史性的特点，昭示着哲学的发展历程，而哲学思考的原动力则来自根源。事实上，就哲学的根源而言，它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情况，但更是人类本性使然。正如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概括的：惊异产生出问题和见识、人类对其已有知识的怀疑引起了批判性的考察和明晰的确定性、畏惧和被抛弃的感觉促使人去探究他的内在心理等三方面。正是因为这种纯粹的、形而上的精神性特质，乃至对真理的持久的热忱。作为哲学原乡的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才能深刻洞察人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以致超越时间、空间的阻隔，至今还启迪着世人在追求“好的”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文艺复兴之后，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独立了出来，而具有独立形态的教育学科也随之出现，其标志就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所著《大教学论》的问世。但就其科学化程度而言，其实是十分有限的。而到了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那里，教育学确立为一门科学的愿望被明确地提出。正如他所说的，

我曾要求教育家具有科学和思考力。我不把科学视为一副眼镜，而把它看作一只眼睛，而且是一只人们可以用来观察他们各种事情的最好眼睛。而这门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心理学和伦理学。当然，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学亦是独立的。赫尔巴特说：

假如教育学希望尽可能严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并进而培植出独立的思想，从而可能成为研究范围的中心，而不再有这样的危险：像偏僻的、被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治理，那么情况可能要好得多。

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学，赫尔巴特的构想是这样的。即先对作为受教育者的人进行最深入的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确立作为受教育者的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后依此形象展开教育。客观地说，赫尔巴特的这一构想本身及其程序虽有缺陷，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已极富科学性特征了。而反思赫尔巴特的人生经历，他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几乎完全生发于其自身对科学研究的热忱，是自成目的的一种人生追求。如赫尔巴特在做家庭教师时，就开始对教育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从而一生追求“在一切事实面前弄清楚：人是个什么样的、为什么能成为人、怎样做才能成为人”等问题。

18世纪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得到全面的发展，西方进入工业文明并以自身为核心建立了全新的世界体系。而正是借助这一体系，其文明成果向全世界扩散。到了20世纪，科学取得了巨大的社会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已非单纯意义上的智力估价了，某些时候甚至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命运。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的召唤下，教育科学研究也加快了自身发展的脚步，并逐渐分化为独立的教育学科。其实现了对传统教育学的全面超越，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此后教育学发展的基调，即以自然科学为导向，以定量研究为特征。这样，在现代教育科学研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以及现代社会对于教育科学研究在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重大意义的充分认识，其愈来愈多地受到各方的关注，并逐渐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不断体制化，以致高度依赖于现存的社会制度。由此，教育科学研究传统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断裂，那种绵延古今的，独立的、具有“精神性”特质的教育科学研究已然沦为了全面服务现

实的、“功利性”的教育科学研究。例如，有学者就指出：

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员。即使他在大学里工作，他也要受到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权益集团的有效控制，即使不是在细节上受到控制，也是研究的总方向上受到控制。科学研究和教学事实上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小小但却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将这一段表述放在现代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亦不为过。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现代困境

人是人，而不是神，每个人都有着基本的人性特质，即拥有理性的同时，亦有这样那样的欲念需要满足。我们并不否认作为人为活动的教育科学研究必须完全拒斥属人欲念的展开。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利益供给可以使教育科学研究获得更好的基础条件，更强大的激励等。我们担忧的是，若是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不能很好地继续在精神性与功利性的张力之中，进而完全为基于现实的、功利性的追求所侵蚀，势必使自身弃守理应坚守的真理追求，以致沦为人类生活的危害。而事实上，当前的教育科学研究往往就会为了实现自身的功利考量而采用某些“策略”。或者说，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功利性其实也体现于这几方面。由此，我们将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学术体制等方面具体探讨。

第一，向政治权力的屈从。在现代国家中，教育科学研究首先是一种由国家意志推动的制度性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体性行为，其不可避免受制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而政治权力作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势必会使得栖身于国家并从国家获得各种资源等的教育科学研究无法逃遁其影响。而且，较之其他教育研究类型，与国家政策制定等紧密相关的教育科学研究更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事实上，由于人性的不完善，政治权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有着“恶”的一面。因此，受制于政治权力的教育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将产生“恶”的后果。当然，在政治权力所造成的“恶”的影响程度上，是有一定差异的，因为政治权力其或是由一人独裁专政，或是由少数人掌控，或是由多数人分享。相较而言，在独裁专政的国家中，教育科学研究往往更难实现其教

育立场、学术使命。如布鲁姆（Allan Bloom）认为，苏联这个可怕的政权从自然科学汲取力量来维持它的统治，而苏联的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必须充当骗子，充当御用文人。可以说，苏联的教育科学研究往往也是受到国家权力的全面控制，如各种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中大量地充斥着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前者不幸成为后者的“学理”注释与吹捧。另一方面，即便是在美国此一标榜“民主”和“自由”的国度里，国家政治权力对科学研究的制控也是无所不在的，如“曼哈顿工程”之类的大型科学研究活动，在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让许多参与其间的科学家愧痛终身。自然科学研究如此，教育科学研究自然更难幸免。事实上，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也承认，在美国，当地、州府和联邦政府的政治家等，常常有不同的行动方向并受到不同的利益驱使。这些人做出的决定影响着教育政策和实践，因此也就影响了试图解释和理解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研究工作，如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数学和科学知识教学标准的研究工作，屡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突然遭遇变故。

反观中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也许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像中国那样，教育领域紧密地服务于其政治生活。显然，浸淫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遗毒之中，当代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自然难脱其桎梏。因此，在严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其实很难指望生长于“传统与现代”叠加的中国当代文化中的本土教育科学研究能够不屈从于现实的政治考量，使政治权力的牵绊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在1949年之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凯洛夫（Ivan Andreevich）《教育学》被引入中国，其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影响之深和影响时间之久，还没有一本其他教育学专著可以与它相比拟。在如此这般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科学研究整体上为政治权力所俘获。而及至改革开放，虽然此一情况有所改观。但教育科学研究往往在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结论的发布等方面依然会或多或少地因政治权力层面的考量，而采取诸如故意漠视“敏感问题”、选择性回避“研究结论”乃至为了保证“政治正确”而改正研究结论等“策略”。由此观之，在国家政治权力各方面的制约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既要生

存与发展，又要实践自身的教育立场与学术使命，其实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第二，与经济利益的结盟。在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都在急切地追求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国际竞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就更是如此了。对于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而言，国家的目标就是经济增长，分配公平和社会公平无关紧要，种族关系和性别关系的状况也无关紧要，改善人类生活品质的其他一些方面仍无关紧要。而在经济增长目标的引领下，教育也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对于大多数现代国家而言，为了经济目的而对教育提出的需求不断增多。在国际上所做的比较，显示出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也显示出为了提高生产力而进行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因而，经济发展与教育质量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让人无法不给予全面的重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尽可能地追求国家利润，现代国家对教育领域投入了尽可能多的投资。而面对诸如如何使用这些投资以改善教学质量、提升师资水平等问题时，与教育实践结合较紧密、研究成果具有一定政策参考性等的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出来。事实上，尤其是二战之后，各国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投入实现了大幅提升。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美国不仅对教育科学研究加大投入，更建立相关管理机构进行有序实施与系统推进。这样，现代情景中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就成了一个利益集散之地。当利益充斥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随之而来的便是其与市场的连接愈来愈难分难舍。具体而言，在诸多的如教育技术、课程开发、图书出版等领域中，教育科学研究往往利用自己在社会乃至政策制定中的知识话语权，与市场的经济优势进行各个方面的配合，在为市场赢得利润的同时，也实现自身在社会影响力、经济收益等方面的提升，而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往往则会被刻意忽略乃至掩盖。但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此类现象并不能遭到及时遏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被鼓励。例如，在作为教育科学研究重镇的大学，此类现象不仅不会受到非难，还会得到如职称评定优先等各种形式的鼓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世界范围内，“金钱日益成为影响大学角色的决定因素。大学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学生的利益，可是他们真正关注的

还是学校里能够赢利的商业活动”。在很多大学中，“筹款”与“创收”即便不是最重要的工作，在各项工作中亦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着“舍利而求义”的传统。但在“五四”运动及之后的历次运动中，强调克服自身私欲的儒家文化遭受重创，传统中国的文化基底消弭殆尽。及至改革开放之后，以“自利”为价值基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得以确立，随之而来的，便是自利的价值取向对既有价值秩序的重构。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有用的价值凌驾于生命的价值，人类文化传统中对精神追求的关注被代之以赤裸裸的物欲追求。在如此的历史境遇中，教育科学研究亦很难“独善其身”，往往也会陷入“自利”的漩涡而不能自拔，一个典型现象即是许多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和教育科学研究人员，以实验基地、合作开发课程与教材等名义敛取经济利益。当然，合理的教育实验等活动应该得到重视，但是当几乎所有的此类活动都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或依附于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名校”时，它们的盈利性目的已然昭显，而这无疑背离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本真诉求。

第三，同学术体制的博弈。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为了自身的功利诉求，不仅可能需求外在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支持，亦可能在学术体制内展开博弈，积极争取自身的利益实现。事实上，关于体制化问题。韦伯（Max Weber）曾说过：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当世界被祛魅，人类生活中的价值理性亦随之凋零，工具理性则难免依仗其简易、实用等特点趁虚而入，并大行其道。而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作，正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可以说，体制化问题的出现与工具理性的现代扩张有着根本性的关联。而函括教育科学研究的现代学术的体制化，亦是现代社会体制化进程中的一环。具体而言，随着教育科学研究影响力的扩大，学术组织趋于庞大，管理学术组织的学术体制在现实的吁求下逐步建立与完

善，其在促进教育科学研究规范性等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拥有了组织层面的自主性。进而言之，当教育科学研究的学术体制建立后，以教育科学研究为标示的学术共同体便有了自己的利益，继而亦难免会极力捍卫自身的存在乃至扩张自己的规模。尤其对于教育科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它的开展往往建立于庞大的人力、物力投资上，没有强大的利益供给，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势必举步维艰。但是，学术体制所能掌控的利益总是有限的，教育科学研究难免会与学术体制内的其他学术共同体因利益而进行博弈，如教育科学研究为了国家、社会的认可度，而与同级别的其他学术共同体产生利益冲突。与此同时，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并不是单一的领域，其中栖身着众多的子共同体，因而其内部亦存在着围绕利益而展开的博弈，如课程研究、教学研究等方向的学术共同体往往就会因在教育改革中的地位而产生利益冲突。因此，为了从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总体利益中多分一杯羹，教育科学研究内的各子共同体之间亦会展开博弈。由此，在各种层次的博弈过程中，教育科学研究学术体制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卷入进来，因为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的地位升迁等都可能决定着一个研究领域乃至一个学科在学术体制内利益分配的地位。在具体的博弈过程中，必要的策略亦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此就曾有过研究，例如，他说：

有一条社会法则，适用于我所研究的所有文化生产领域，包括艺术、文学、宗教、科学等等，就是说引入异治性的行动者，是那些根据场域或特定标准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

在这样的情境中，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乃至腐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上，在西方的影响下，近代以来中国学术体制不断发展、完善，实现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客观地说，当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因学术体制内的利益博弈而产生的问题依然很多，首先，态度上的夸饰化。就科学的缘起而言，它无疑应以追求真理为旨趣。但在当前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利益博弈过程中，科学研究应有的那种对真理的审慎、责任乃至真诚都不能得到重视，一些组织、学科乃至

个人似乎都热衷于或习惯于夸大自己的优势及可能的贡献，以获得关注乃至资源，从而使自身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乃至壮大。其次，关系上的等级化。对于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而言，看似没有科层制的约束，是自在而柔和的。但事实上，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具有优势的人往往身居学术圈子的上游，即所谓“学术领袖”和“学术守门人”，处在下游的则是 有门属的学术新人，而介于两者中间的则是大量的所谓“圈内人”。由此，利益博弈中的地位分化直接导致了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内部关系上的等级化分布。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困境超越

由上观之，在当前这个时代，现代教育科学研究逐渐背离了其原初的价值追求，不再致力于探求世界的奥秘，而在真理与功利的张力中迷失了自我，在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学术体制等因素的纠缠中制造谬误，因而其客观性、中立性等本质上就是存疑的，并不值得我们无条件地信任。由此，我们应积极重塑教育科学研究在追求真理与实现功利之间的张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从教育科学研究的内、外两方面入手以实现此一目标。

首先，对于非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深化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认识。从根本上说，由于人性的局限，任何一种人为事物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或者说，当教育科学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它已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自身，都不可能一直保持它“出生”时的纯真（如果确实曾经有过的话）。因此，对于教育领域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在认识层面上，都需要切实改变以往那种可能存在的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无条件的乃至盲目的信任和依赖。而应深刻意识到，教育科学研究即便曾经为人类教育的进步做出过属于自己的贡献，但并不代表它就无过错，或者未来不会犯错，以科学之名践踏道德、以科学之利伤害人类等问题，会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下去。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理性态度即是，在认可教育科学研究对教育发展已有的或可能的贡献的同时，亦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有深刻的体察。这种认识的提升不仅需要当事者不断的内在省察，更需要外力的扶助。例如，在可能的情况下，社会、学校等可以教育科

学研究者为主体，结合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案例，组织多样的反思性的研究与讨论活动，让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在实例中加深自己对教育科学研究可能危害的认识，破除他们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不切实际的盲目信任。

另一方面，保障教育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就教育科学研究的本意而言，无疑在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但由于人性的不完美，人总是很难直观地洞察真理。由此，在属人的世界中，真理的显现总是异常艰难的，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实现，甚至永不可能达到。正是在此意义上，人只能不断接近真理，而无法获得真理。而思考的问题无法得到解答，并不代表它是无用的，它意味着人对所生活的世界的深刻关切，乃至对“好的”生活的执着态度。也正因为此，古希腊的哲学探讨往往以更多的问题而非答案收场，而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往往被新材料、新发现所不断推翻。由此观之，教育科学研究要不断地逼近真理，只能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努力探寻。至于此一探寻的基础，则是在于人的自由的独立思考乃至人与人之间的不断的自由、平等对话。因为，对真理的追寻不能过多地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等设定的框架，条条框框的过分限制只能使教育科学研究中应有的自由思想濒于僵死，以致使其为各种各样的教条所充斥，使追求真理的进程停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教育科学研究必须对现有的知识基础乃至社会观念等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这决定了其不能太多地受制于政治权力等的束缚。否则，必然不利于教育科学研究超越现有的研究水准与社会认识水平，对教育中的未知领域在更深层面上进行开拓。

其次，对于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而言，则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提升教育科学研究的主体道德意识。从根本上说，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属人的事业，以服务于教育的发展为宗旨，无疑时刻须以道德为依持。因为，无论从人性的要求及教育的归旨观之，道德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而要保证教育科学研究人员能够坚守自身的道德立场，不致成为“一无所有的经验主义”和“没有头脑的计数器”，乃至为多样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等所

诱惑与裹挟，进而伤害人类生活的根本利益，势必应注重提升教育科学人员的道德意识。事实上，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因为教育科学研究者自身缺乏对道德立场的坚守，以致对教育乃至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危害的案例并不少见。如有学者就指出，马卡连科（Anton Semyonovich Makarenko）有组织、有纪律之集体主义的思想就是在为专制国家教育代言。而在当前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亦有着诸多的教授以大学的名义，以服务于大学整体利益为理由，在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竞标、学校与学科评估中做出了诸多有违自身职业道德的，乃至悖逆于做人基本道德的事情。由上观之，积极、全面地提升教育科学人员的道德意识其实是十分必要，乃至紧迫的。另一方面，构建教育科学研究的全面约束机制。虽然正如上文所说，提升教育科学人员的道德意识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指望“人人为尧舜”以超越教育科学研究的困境，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普通人并不值得信赖。事实上，现代启蒙哲学认为，通过启蒙教育，常人或普通人性者最终都会意愿和能够“认真改善自身”，或者说，人人都可能最终成为哲人。但在古典智慧看来，人性的差异亘古不变。可以说，现代启蒙哲学的人性观有其进步意义，但过度迷信贫乏的多数人能够企

及崇高的德性，只会虚构出“道德的乌托邦”。近世以来的诸多历史实践已然表明，妄图在此岸实现彼岸的道德天国只能招致多样的世俗罪恶。因此，对人为活动的约束机制的构建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当然，对于教育科学研究而言亦应如此。具体而言，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应以自身的本然立场为基础，结合具体的时代情况，在制度、舆论等层面针对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构建全方位的约束、监督机制及相应的评价机制等，防止其阻滞乃至伤害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不仅如此，我们亦应对教育科学研究共同体自身予以同样的约束与监督，并构建畅通的自我批评与纠错机制等。因为，正如上文所

论，教育科学研究的共同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便共同体中的个体有较高的道德自觉或较强的行为约束能力，也并不足以保证共同体不会基于私己的利益考量而屈从于政治权力等，进而伤害教育与社会的发展。

（傅淳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北京 100875；杜时忠，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9）

（原文刊载于《现代大学教育》2015年第4期）

批判话语分析在大学章程文本中的应用研究

——以新加坡国立大学章程为例

张奂奂 高益民

一、引言

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语篇分析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CDA 研究的队伍庞大、流派众多，其中以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创立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体系最具影响力，这一体系的主要理论来源包括社会批评理论和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因此，这一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将语言学上的文本分析同社会学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研究者既关注静态的社会情境，又突出动态的意义建构过程，真正做到了联系、发展地看待社会问题。

二、批判话语分析在大学章程文本中应用的研究路径

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包含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三个研究维度，即“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文本是话语实践的产物，话语实践是文本的生产分配消费过程，而话语实践是由社会实践所决定。以这三个维度为基础，费尔克拉夫提出了批判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见图 1）该框架应用到章程的文本分析中大致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描述章程文本的语言使用和篇章结构特征。单纯的语言使用特征，可以描述文本的情态系统（modality）、及物系统、分类系统、名物化和被动化的运用以及隐喻表达。文本的篇章结构特征，可以从章程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甚至章程文本内部的篇际互文性入手。同时，我们可借助 WordSmith 软件的语料库分析方法查询和统计大样本章程文本中的高频词，或使用语境共现检索（concord）功能查询搜索词（search word）的常用词丛搭配甚至可以扩展到该词丛所在的索引行。还可使用关键词（keywords）功能揭示文本中超常使用的词，即与

某一标准相比频率显著偏高的词，偏高的程度就是该关键词的“主题性”（keyness）。这里需要说明语料库语言学中的主题词含义和传统上表示“重要”之意有所区别，它指在和参照语料库（reference corpus）比较时统计出的具有特殊词频的词。也即，一个词是否是某一文本的关键词，不是取决于该词在该文本的出现频率，而是取决于该词在与之相对比的参照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这种方法为研究和对比不同章程文本的主题提供了定量分析的实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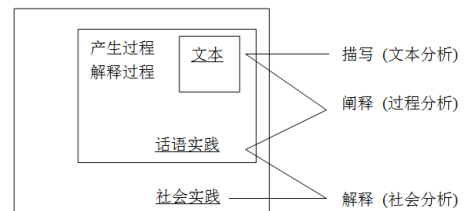


图1 费氏的三维分析模型

第二步是阐释章程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这是话语分析的关键环节。具体而言，依据章程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辨识其语体、话语角度和风格以及这三个要素在同一文本中的搭配组合，这是研究章程文本的生产过程。表达权力和义务关系的情态动词可以体现章程文本的风格；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的语法现象则可以反映章程文本的语体和话语角度，比如，被动化和名物化的运用可以将章程某些利益主体的行动抽象化或者把某些施事主体隐性化或者淡化。章程文本的分配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指章程实施的状况，研究章程文本和学校公布的年度报告或者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记录可以明确两者话语角度的呈现方式是否一致，以此来说明章程在执行过程中某些政策是否发生二次扭转。

前面两个步骤都是文本在说话，而最后一步是研究者在说话，研究者在最后一步需要解释章程话语实践过程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话语实践受制

于社会实践，反过来也构建社会实践，即话语实践具有建构性又是被建构的。社会实践分析的目的在于解释话语实践为什么会是这样。章程文本的社会实践分析主要是解释章程文本背后的多元主体权力配置关系形成的原因以及大学与政府和市场之间外部关系的确立是如何受社会变迁的影响。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微观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的社会分析被话语实践分析联系起来，话语实践充当了连接语言运用和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这是费尔克拉夫批判话语分析方法论体系的精髓所在。

三、新加坡国立大学章程文本的批判话语分析

(一) 理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情态系统的分析

章程文本的语言风格是对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再现，体现了教师、学生作为大学管理者参加大学治理身份的认同程度。章程制定者力图使用章程文本的语言风格去说服利益相关者和大众接受其设定的人际关系和勾画的权力格局，而人际关系的功能主要通过情态系统的表达来实现。本文运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关情态系统的理论分析新加坡国立大学（以下简称“国大”）章程文本情态动词的使用特征及其映射的人际意义。按照韩礼德对情态三种赋值的划分，shall, should 等词的取值是中值，而 may 的取值为低值，must 的取值为高值。

运用 WordSmith 软件的词频列表（wordlist）功能，我们发现在国大章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是 shall 和 may，分别占文本词数百分比的 1.65% 和 0.85%，其次是 must 和 should，各占 0.07% 和 0.03%。词频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情态动词的词频分析

量值	情态表达	数量	百分比
高	must	14	0.07
中	shall	327	1.65
	should	6	0.03
低	may	168	0.85

国大章程重视大学内部组织架构的划分和人员的职权界定，通过使用高、中、低值的情态操作语来规约各个责任主体的权力和义务，理顺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让我们首先讨论出现频率最高的 shall，

运用 WordSmith 软件的语境共现检索功能，以 shall 为搜索词，把词丛跨度设为 1 到 6，能够最大限度产出 shall 的搭配词（collocate），排在前几位的主要有董事会（Board）、学生（Student）和评议会（Senate）。

1. 学术评议会和董事会的权力制衡。大学章程首先要明确规定大学的学术机构，学术评议会是国大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负责管理大学的学术工作、规范并监管学生的纪律、享有制定大学学术政策的全部权力，可以和各个院系、研究所直接打交道。如，章程 2 第二条，the powers of the Senate shall be to: (a) establish, organise, rename and dissolve Faculties and Academic Units; (b) ...，规定了评议会的学术权力：设立、组织、重命名和解散学院、学术单位和研究所；制定、审查和终止学术项目；规范学生的入学资格，出勤率；任命并指导考官和考试委员会，并监督考试；授予、剥夺或撤销学位、学历、证书以及其他荣誉标志；设立、审查和授予各种助学金；颁发荣誉学位和名誉教授称号。再如，章程 2 第五条，Every power or duty delegated... shall continue to be vested in the Senate but shall be so vested concurrently in the Senate Delegation, 其中 shall be vested 规定所授予的一切学术权力或职责属于评议会，也属于评议代表团。此外，章程中还规定了评议会和评议代表团的人员构成、会议法定人数、任期和选举、工作程序等内容，从而使得评议会组织具有合法性和规范性，也保证了大学决策的民主公道。条例 1 第四条 (c)，agendas of meetings shall be delivered seven Days in advance before the date of any such meeting to each person...，规定了评议会的会议程序，即评议会的义务：应在任何会议召开前 7 日将会议通知和议程发送至有权投票的每位与会成员。

国大的董事会主要是引导和规范学生社团和活动，确保学校的各项纪律得到落实，并确保大学资源得到有效使用。章程 5 中提到：The Board of Trustees shall have power to make Regulations, rules...，董事会有权制定规则、规定、政策和程序，以管理学生会及其任何组成机构。The Board of Trustees...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在校长建议

的基础上，董事会有权对学校历史赠与的规定进行更改。在涉及捐赠基金等财务事宜上，还设立了投资委员会以辅助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管理学校基金，以产生用于支持学校作为高等教育公共机构的相关活动的稳定收入来源。

权力制衡理论的经典创始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权力不能过分集中,这样才能有效地预防独断专行的决策行为。国大大学评议会和董事会是平行的组织，同由大学理事会管理，是一种典型的两院制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也是英美一流大学的主导治理模式。评议会主要负责学术事务，主要由教授代表组成；董事会的职能以管理为核心，负责行政和财务事宜，包括管理捐赠和基金以及学生社团等,主要由大学之外的人员组成（社会名流、企业领袖、校友代表、政府官员构成了董事会的大多数）。为了使整个治理过程更加公

开和透明，评议会和董事会下设有许多附属委员会，分委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发展目标与作用，向评议会提出建议，它们分别是学校教育政策委员会、荣誉学位和名誉教授提名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纪律上诉委员会，其中纪律上诉委员会由一名董事会成员担任主席。

2. 学生纪律处分制度完备。将国大章程的文本建为观察语料库，美国三所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章程文本建为参照语料库，一般要求参照语料库的库容是观察文本的2倍以上。通过 WordSmith 软件的关键词检索功能对比两个语料库中某一关键词的主题性，发现观察文本中纪律（discipline）、申诉（appeal）、学生（student）这三个词的显著频率偏高，证明有关学生纪律处罚的规章制度是国大章程的一个特色，值得进一步研究。章程词频的主题性分析见表 2。

表 2 国立大学章程词频的主题词分析

N	keyword	1. Freq.	2. %	3. RC. Freq.	4. RC. %	5. Keyness
1	DISCIPLINAR	146	0.7387	0		365.58
2	DISCIPLINE	103	0.5211	4		226.3
3	APPEALS	83	0.4199	0		207.64
4	GIFT	99	0.5009	9	0.0183	191.83
5	STUDENT	164	0.8297	104	0.2115	122.62

例 1: Any student who is alleged to have committed or attempted to commit..., may be subject to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a) ... (r); an existing student of the University at the time the allegations of offences are adjudicated: (a) ... (g);

例 2: the student may..., appeal to the Dean of the corresponding Faculty...

例 1 是章程 6 第三条和第十条分别列举了可能导致纪律处分的 18 种情形和 7 种惩罚措施，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章程详细列举了纪律处分的依据：学术不守信，诽谤或殴打学生或教员；性骚扰或种族歧视；恶意投诉学校员工或学生；有损学校声誉；不遵守学校行政处分等。这些“不当行为”的明确规定为高校管理学生提供了详细可靠的法律依据，用以判断学生行为的适当与否，并根据行为不适当的种类和程度级别，采取对学生的不同程度的惩戒措

施，比如罚款、公开谴责或者勒令退学等，从而避免了高校与学生的纠纷，达到了真正的“有章可循”。

国大通过章程的强制约束力对学生实行严格管理，学生有义务遵守国大章程中的纪律规定。然而，通过例 1 和例 2 中 may 这个低值情态词的使用，我们发现章程也赋予了学生一定的自主权和申诉空间，即学生可以默许校方的制裁，也可以选择申诉，体现章程对法律受众主体学生权利的许可：如果教务长对其处罚有争议，可向其所在学院院长上诉（在学术单位负责人给其纪律处分的情况下）或向负责学生事务的院长上诉（在非学术单位负责人给其纪律处分的情况下），也可进一步向纪律上诉委员会呈递申诉报告。纪律委员会和纪律上诉委员会都会提前 14 天书面通知相关人员需要举行一个公平的书面和口头听证会，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时间准备材料抗辩。章程通过完备的上诉和听证制度，维护了学

生作为学术共同体一员的合法权利，遵循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律原则。

章程作为一个高校的根本大法，是高校制定规则的依据和阐述其作为独立法人使命的典范，这就要求其语言具有准确性和规范性，使各利益主体的权力和义务一目了然，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也没有理解上的歧义现象。所以，在其语言中大量使用表示权力和义务的情态动词 *shall*。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反映权力意志的高值情态表达成分 *must* 和 *should* 很少在文本中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表示相对平和语气的中值情态词 *shall* 和低值情态词 *may*，其原因可能是：*shall* 通常表示应履行的义务和被赋予的权力，*may* 本身含有一种“可以但不必须”的意思，通常表示主体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容易让读者产生认同感，而 *must* 和 *should* 表示应服从的命令，使文本从人际意义的角度给人一种居高临下和强迫的感觉，从而缩小了文本与读者的人际意义协商空间。劝说高校的各利益相关者以责任主体想要的方式自愿地行动，也就是通过语言营造认同感或至少是达成默契来行使权力，要比强迫（*coercion*）更有效，这是一种缓和章程条文过于命令化、抽象化和非人格化的一种有效的语言手段。

卢梭（*Rousseau*）认为，一个人或组织无论有多么强大，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权力（*power*）转化成权利（*right*），把他人的服从（*obedience*）转化成义务（*duty*），是不能长久支配他人的。语言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国大章程通过两类表示义务与权力的情态表达式的使用，尤其是 *shall* 和 *may* 的多次重复使用，潜移默化地把主体自身的权力转化成权利，把他人的服从转化成义务。

（二）构建新型的外部治理格局——互文性的分析

“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的，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转化。”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克丽丝蒂娃（*Kristeva*）把语篇的这一特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她看来，每个文本好像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模仿和转化，是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引用和相互吸纳。国内学者辛斌从读者或者分析者的角度把互文性分为“具体的”（*specific*）和“体

裁的”（*generic*）。具体互文性指一个语篇包含可以找到具体来源（即写作主体）的他人的话语，包括那些不加标明引用他人话语而产生的互文关系；体裁互文性指在一个语篇中不同文体（*style*）、语域（*register*）或体裁（*genre*）的混合交融，巴赫金将其称为“杂体语言”（*heteroglossia*）。费尔克拉夫认为，对于语体、话语角度和风格的辨析是文本互文性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在具体互文性分析方面，话语角度可以被用作突破口，揭示某种意义表述是如何操控语篇读者认同作者所建构的社会身份和传递的意识形态；在体裁互文性分析方面，语体即体裁可以作为切入点，以展现语篇作者的价值取向以及文本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变迁。通过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章程文本中语体与话语角度的分析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组合，我们发现章程制定者成功地运用了具体互文性和体裁互文性两种互文手段，向读者呈现了大学新型的外部治理格局，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形成此种格局的主流意识形态：新加坡社会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集权化思想作为一股潜在力量制约着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大学治理理念的现实路径选择，即政府在适当放权、大学获得自治的同时从来也不会放松对大学的引导和管理。

1. 大学与市场——体裁互文性的视角。在批评语言学里人们经常用“话语殖民”（*discourse colonization*）或者“话语霸权”（*discourse hegemony*）这两个词来比喻不同体裁或者文类的相互影响与渗透，这种影响与渗透表现在语篇中就是“体裁互文性”（*generic intertextuality*），即不同体裁特征在同一语篇中的混搭使用。从章程 7 和章程 8 对学校的赠与和捐赠基金使用的各项规定中，我们发现招标（*solicitation*）、投资（*invest*）、投资委员会（*investment committee*）、稳定收入来源（*consistent stream of income*）、获取收入（*earn income*）等商业领域的词汇充斥在章程这样的教育法规语篇中，这种现象反映了商业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话语对教育话语的殖民趋势。这就是不同体裁的典型特征在同一语篇中的混搭使用，即语篇的体裁互文性。章程文本这种体裁的混合使用正折射了新加坡大学公司化改革的社会背景。

2006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司化法案》提出新加坡国立大学由政府全资投入的法人机构转向有担保的企业型责任有限公司，大学变革为企业化大学后，对法定机构的有关规定和限制就不再适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被引入高等教育系统，大学在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和风险，需要不断接受政府的问责。进而言之，当商业话语的殖民趋势置于大学公司化改革这一具体的社会情境时，高校的营利行为和商业活动在章程中得以合法化和制度化。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言语体裁能比较直接地、敏锐地、灵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是联结语篇与社会语境的桥梁。”

2. 大学与政府——具体互文性的视角。具体互文来自新加坡教育部1980年颁布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法》（2001年修订），这个外部法界定了大学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弱化政府控制，强化大学自治，是对大学自治身份的认同。章程旨在宣扬大学自治的理念，对这个法案最基本的原则或政策方针加以引用并转化是必然的事。我们认为，章程对政府出台的基本法案的互文是界定大学与政府关系的重要策略。

章程7中规定学校具有管理和控制基金的唯一权利（the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sole right to...），唯一具有了排他性，意指大学拥有完全独立的财务自主权，不受政府的制约。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第7部分是这么表述的：大学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任意（All moneys paid to the University...for all or any of the purposes）支配各种款项。章程和教育法的语义呈现角度具有高度一致性（话语角度一致）：都强调了大学拥有高度的财政自主权，可以管理使用自己的经费，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效率的使用。在这段互文性中，大学自治的身份通过 *sole right* 和 *any of the purposes* 两个词被建构并被合法化。正如 Fairclough 所言，互文性与权力有紧密的关系，尤其法律语篇是权力的表达，互文性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策略，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符号功能。

陈永国对克丽丝蒂娃的互文概念重新做了阐述，“互文引语从来不是纯洁的、清白的、直接的，

它总是被改变的、被曲解的、被位移的、被凝缩的，总是为了适应言说主体的价值体系而经过编撰的。可以说，互文性这一语言现象具有意识形态传递功能。”《新加坡国立大学法》第7部分明确指出财政部长应该不时地把议会拨给大学的资助以基金的形式如数拨付；章程规则12指出政府对国大捐赠基金保持1:1配套资助的原则，并将政府配套资助累加到国大捐赠基金中，甚至根据捐赠用途提高资助配比，比如捐赠用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1.5:1）或者促进诸如国大耶鲁学院这样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3:1）。从这段互文我们可以发现章程在呈现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时做了适当的扩充和调整（话语角度的修正）：政府不仅充当了服务购买者（*service purchaser*）同时又是一个促进者（*facilitator*）。具体来说，新加坡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呈现出了两个新的动向：其一，虽然实行了公司化改革，政府的拨款仍然是新加坡公立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据统计，2004年，国大、南洋理工、新加坡管理大学捐赠基金合计约为17亿美金，私人捐赠和基金投资收入目前只占到了三所公立大学总常规收入的0.3%~2.7%。教育部的经费在大学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最大，为75%。新加坡政府把充足的财政资助看作是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政府有充足的财政预算去确保国大和南洋理工去追求卓越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其二，通过政府对大学捐赠的配套资助可以洞见政府角色职能的转变：随着大学治理和资助体系的改革，新加坡政府逐渐从直接干预的控制者转变成远程遥控的促进者，通过提供适当的刺激与奖励为大学追求卓越营造一种更有利的竞争环境。政府的配套资助属于一种激励机制，在这种激励框架下鼓励大学加大筹款力度，建立与社会的广泛联系，积极寻求和拓展经费来源，例如提高高校从捐赠和基金会等第三方吸纳资金的能力来辅助其目标和任务的达成。同时，为激励捐赠者积极捐赠，推动新加坡正在萌芽的慈善文化，政府还提供了各种捐赠命名机会，以允许大学可以更为确定地获得潜在捐赠。

总之，大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在不同的国家，政府、市场对大学的作用迥异，大学自身权力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大学、政

府与市场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大学不是政府和政治领域的延伸的信条，要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政府的角色要适当，市场的边界要合理。新加坡虽然属于典型的遵循市场逻辑、秉持市场经济发展加速论理念的国家（market-accelerationist state），但由于受到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新加坡政府和大学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新型关系样态，既不同于传统的政府计划干预，也不同于完全自治。新加坡政府通过不断的宏观管理和外部引导确保了大学成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有效地抵制了市场机会主义，这证明了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完全被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所淹没。

四、结语

批判话语分析自问世以来就致力于揭露和最终摧毁不平等的控制与从属关系，以及权力滥用造成的不平等，尤其在官方政策文本中它一度发挥着“批判”的功能。但是，随着其在各个学科的广泛运用，它的功能也开始发生转向。在章程文本分析中，批判话语分析的作用不一定一味地聚焦意识形态的批评和权力不对等关系的揭露，研究者不能总去寻找

文本的话语矛盾作为切入点。批判话语分析应该成为沟通章程制定者和教师、学生、行政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以及政府和社会的重要渠道。批判话语分析主张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表明：话语分析不仅是一种反映现实的工具，又是一种干预现实、建构现实的工具。理解章程文本意味着理解章程产生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探索章程制定的语境、过程与文本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意味着更好地理解章程在建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的意义，在后资本主义语境下章程文本如何作为“透镜”去表征社会变迁的过程是今后批判话语分析的重要任务。

（张奕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高益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5）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11期）

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定量分析

——以政策工具为视角

李科利 梁丽芝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定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政策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和调控作用。与此相适应,与高等教育政策有关的学术研究也逐步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的视角,重点探讨以下问题:一是这些高等教育政策采用了哪些政策工具?二是这些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怎样的特点?三是运用基于政策工具理论的政策分析框架来剖析已有的高等教育政策体系是否合理,并借此为未来高等教育政策的优化和完善提供有效的指引。

一、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分析方法与样本选择

(一)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定量分析方式对高等教育政策文本进行研究,主要选择国家级高等教育政策文本作为内容分析样本进行分析,首先将各个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工具内容进行编码以定义分析单元并进行初步的描述性分析,再根据政策工具理论

制定分析框架,随后把符合框架的政策编号归入分析框架中进行频数统计,最后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在政策工具的选择、组织与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样本选择及文本编码

本文所选择的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均为公开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教育政策法规检索系统及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由于涉及高等教育政策的文本数量众多,为了选取的准确性和代表性,笔者按照以下原则对政策文本进行了整理和遴选:一是发文单位为国家级机关,主要以教育部为主;二是直接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三是政策类型主要选取法律法规、规划、意见、办法、通知等体现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的相关政策文件;四是发文时间从1994年到2014年。原因在于1994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试行“并轨”招生,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本文共收集了政策样本159份,并自行设计了分析单元编码表(见表1)对159份政策文本进行信息抽取。

表1 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表

政策编号	政策名称	文本性质	政策年度	政策主体	政策领域	政策主题	内容编码	政策工具类型	政策工具
1	《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	规定	1993	教育部	学校管理	学历管理	1-1 1-2	学习工具 权威工具	信息发布 管制
2	《关于进一步做好授予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任职资格评审权工具的通知》	通知	1994	教育部、人事部	学校管理	师资管理	2-1 2-2	学习工具 权威工具	信息发布 管制
...
158	《关于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核准与实施工作的通知》	通知	2014	教育部	学校管理	制度建设	158-1 158-2 158-3 158-4	象征与劝诫工具 权威工具 学习工具 学习工具	号召要求 宣传学习 信息发布
159	《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	通知	2014	教育部	学校管理	综合管理	159-1 159-2 159-3	学习工具 权威工具 权威工具	信息发布 要求 管制

二、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统计分析

本研究从政策文本的文本形式、年度与数量分布、领域与主题分布以及政策文本所含政策工具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一) 文本形式

遴选出的 159 份政策文本中，其标题大致有“通知”“意见”“办法”“法律”“规定”“决定”“规范”“纲要”“方案”“规程”等几种形式（见表 2），其中发现“办法”“意见”“通知”等形式

出现的政策文本最多，占总数的 86.2%，这类政策多是对早期总体规划的补充性说明，或者直接针对某一具体领域做出的相关规定。相比之下，以“法律”等名称出现的政策文本则相对较少，目前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这一部法。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仍停留在管制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以政府的意志为中心，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实施者高等学校来说主动办教育的意识相对较差。

表 2 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类型统计情况

文本类型	数量	比例 (%)	文本类型	数量	比例 (%)	文本类型	数量	比例 (%)
办法	16	10.1	规程	4	2.5	决定	1	0.6
办法、决定	1	0.6	规程、通知	1	0.6	决定、意见	1	0.6
办法、通知	25	15.7	规定	10	6.3	条例	1	0.6
法律	1	0.6	规定、通知	4	2.5	通知	40	25.2
方案	1	0.6	规范	1	0.6	细则、通知	2	1.3
方案、通知	3	1.9	计划	1	0.6	意见	28	17.6
纲要	1	0.6	计划、通知	1	0.6	意见、通知	10	6.3
纲要、通知	4	2.5	纪要、通知	1	0.6	制度、通知	1	0.6
合计	159				100%			

(二) 政策年度与数量

本研究主要选择 1994 年作为所采用政策文本的起始年度，主要因为我国在 1994 年开始试行高等学校“并轨”，并选择 40 多所高校进行试点。但为起到一定的参照作用，本研究也把 1993 年的相关数据纳入进来。通过统计发现，高等教育政策的数量在 1999 年到 2006 年较为集中，而在 1994 年、1999 年、2002 年、2003 年、2004 年、2006 年的数量尤为突出（见图 1）。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相关的背景知识发现，1994 年高等学校试点并轨，1999 年教育部决定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从 1998 年到 2002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 108 万人增加到 34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 以上。2003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科、高职（专科）共招学生 382 万人，比 2002 年增长 19%，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 1900 万人，比 2002 年增长 30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7%。2004 年高等学校在校生突破 2000 万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我国开始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说明我国高

等教育政策数量与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三) 政策主题

透过政策主题可以了解政策文本的主旨与目的。根据高等教育的三项基本职能和高等学校的主要活动，笔者把高等教育政策领域中政策工具的使用分为四大领域：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校管理。通过对 159 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主旨及内容的分析发现，围绕四大政策领域，高等教育政策所涉及的政策主题非常广泛，几乎涵盖高等学校的方方面面（见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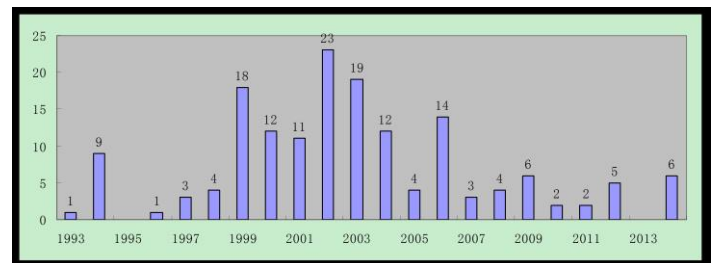


图 1 政策年度发文数量统计情况

表 3 政策文本所涉及的政策领域与主题

政策领域	政策主题
人才培养	教学改革 教学过程 教学质量 办学 教育改革 课程建设 课程设置 师资培养 研究生培养 招生 专业设置 教学方式 教学理念 教学公平
科学研究	基础建设 科技创新 科研创新 科研管理 人才培养 师资培养 学科建设 学术 期刊 知识产权 资金管理 成果奖励 成果评价 学术道德
社会服务	成果转化 支教 服务社会 学生管理
学校管理	办学 财务管理 出版社 后勤管理 教学管理 科研管理 人事管理 师资管理 师资培养 图书馆 校园环境 学历管理 学生管理 学术期刊 学位管 理 招生 制度建设 治理结构 资产管理 综合管理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师资培养 学科建设
社会服务、科学研究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科技园
学校管理、人才培养	教学质量与学历管理
综合性	综合管理

(四) 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不同的学者对于政策工具类型的看法不一样，我国学者普遍认同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霍莱特和拉梅什的分类方法，即将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 3 类。而在相关教育政策工具的文献中，如林小英、侯华伟的《教育政策工具的概念类型：对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初步分析》、李津石的《我国高等教育“教育工程”的政策工具分析》、黄忠敬的《教育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策略》、吴合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演变分析》等，较多参考了麦克唐纳和艾穆尔 (McDonnell & Elmore)、施耐德和英格拉姆 (Schneider and Ingram) 对于政策工具理想类型的分类，即将教育政策工具分为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学习工具、系统变革工具等。本研究综合各种因素，所采用的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类型为：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学习工具、自愿性工具。权威工具是政府使用法律、直接行政和管制等方式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本研究把制度、标准、要求、禁止、评估、监管、许可等纳入权威工具范

畴，并把制度、标准、禁止、评估、监管、许可等统称为管制。激励工具是通过能带来切实回报的奖励（或惩罚）去诱导目标群体采取行动，具体包括奖励与惩罚。能力建设工具是指提供个体、群体或机构以做决策或采取某种行为的信息、培训、教育和资源给那些有能力的个体、群体或机构去决策或开展活动，包括补助与支持、基础设施与制度建设、政策优惠等。象征与劝诫工具通过价值倡导、认同、整合、同化等策略诱导目标群体按照政策所倡导的理念和目的去行动，具体包括鼓励与号召。学习工具依靠目标群体自身的能力去解决相关政策问题，包括信息发布、沟通、协商、宣传学习等。自愿性工具也可称为志愿性工具，是指通过个人、家庭、社会组织或市场发挥作用，在自愿的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途径和方法，主要包括：市场、社会力量及自我管理。由于相关政策文本中这三项的界限不是很明显，但又具备自愿性工具的精神内核，本研究在进行编码时把这些统称为社会参与。另外本研究把出现“改革与优化”等字眼的政策事项也纳入了自愿性工具范畴。通过对 159 份政策文本在内容编码的基础上使用频数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政策工具统计情况

激励工具	奖惩	合计	象征与劝 诫工具	号召	合计	自愿性 工具	社会参与	合计
	39	39		88	88		11	11
权威工具	管制	评估	要求	合计	学习工具	信息发布	宣传教育	合计
	45	6	86	137		119	12	132
能力建设工具	基础建设		人才培养	政策优惠	支持	制度建设	合计	
	11		4	9	34	2	60	

通过表 4 可知，对于政策工具类型来说，使用最多的是权威工具和学习工具，分别占 29.3%、28.3%，其次是能力建设工具和象征与劝诫工具，分别占 12.8%、18.8%，相对较少使用的是激励工具和自愿性工具，分别占 8.4%、2.4%，对于具体政策工

具来说，明显使用较多的是信息发布、要求、号召，分别为 25.6%、18.4%、18.8%，使用最少的是制度建设，进一步分析发现，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较少，更多的是多种政策工具混合使用，其中权威工具与学习工具中的信息发布工具配套使用较多，其目的

也是为了更好的使用权威工具。

(五) 引入主题维度的政策工具使用状况

由前文可知,本研究把政策领域分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校管理四大领域。按照政策工具类型和政策领域构建二维表(见表5),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主要集中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校管理三大块,排第一位的是学校管理,

第二位的是科学研究,第三位的是人才培养,最后是社会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对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工作干预过多,而对于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人才培养有所忽略,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当今社会高等教育质量为什么不够高,教学内容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脱节等现象。

表5 基本政策主题维度的政策工具使用频数统计情况

政策领域	政策主题	政策工具类型						合计
		激励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权威工具	象征与劝诫工具	学习工具	自愿性工具	
科学研究	基础建设	0	1	2	0	1	0	4
	科技创新	0	5	0	2	1	1	9
	科研创新	0	2	0	4	1	1	8
	科研管理	0	1	2	0	1	0	4
	人才培养	0	4	4	0	4	0	12
	师资培养	0	2	3	2	0	0	7
	学科建设	2	5	3	2	3	0	15
	学术期刊	0	1	3	1	1	0	6
	知识产权	1	0	2	1	1	0	5
	资金管理	0	1	2	0	1	0	4
	成果奖励	2	0	1	1	1	0	5
	成果评价	0	0	1	1	0	0	2
	学术道德	3	0	6	4	3	0	16
合计		8	22	29	16	20	2	97
人才培养	教学改革	0	0	1	0	2	0	3
	教学过程	1	0	1	1	0	0	3
	教学质量	1	2	4	4	3	1	15
	办学	1	0	3	1	2	0	7
	教育改革	0	0	0	1	1	0	2
	课程建设	0	1	2	0	1	0	4
	课程设置	0	0	0	1	2	0	3
	师资培养	1	2	1	0	1	0	5
	研究生培养	1	1	1	1	0	0	4
	招生	0	0	1	0	1	0	2
	专业设置	0	0	1	1	1	0	3
	教学方式	0	0	0	1	0	0	1
	教学理念	0	0	0	1	0	0	1
教学公平	0	2	1	0	0	0	3	
合计		5	8	16	12	14	1	56
社会服务	成果转化	2	5	2	2	4	1	16
	服务社会	0	0	2	2	1	0	5
	支教	0	1	0	1	1	1	4
	学生管理	0	1	0	1	1	0	3
合计		2	7	4	6	7	2	28

学校管理	办学	0	1	4	4	2	1	12
	财务管理	3	0	18	5	15	0	41
	出版社	1	0	0	1	1	0	3
	后勤管理	1	2	3	2	4	0	12
	教学管理	2	0	2	2	3	0	9
	科研管理	1	0	0	0	1	0	2
	人事管理	1	0	2	1	2	0	6
	师资管理	0	0	1	0	1	0	2
	师资培养	1	1	3	3	3	0	11
	图书馆	0	2	0	1	1	0	4
	校园环境	1	0	5	1	4	0	11
	学历管理	0	0	1	0	1	0	2
	学生管理	3	5	8	13	12	0	41
	学术期刊	0	2	1	0	1	0	4
	学位管理	0	0	1	0	1	0	2
	招生	5	0	14	3	13	0	35
	制度建设	0	0	4	3	5	0	12
	治理结构	0	0	2	3	4	1	10
	资产管理	1	0	1	1	1	0	4
	综合管理	1	0	10	8	10	0	29
合计		21	13	80	50	85	3	252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师资培养	0	2	2	0	1	0	5
	学科建设	1	1	3	1	2	2	10
合计		1	3	5	1	3	2	15
社会服务、 科学研究	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	1	4	1	2	1	1	10
	科技园	1	3	1	0	2	0	7
合计		2	7	2	2	3	1	17
学校管理、 人才培养	教学质量、 学历管理	0	0	1	0	0	0	1
合计		0	0	1	0	0	0	1
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	0	0	0	1	0	0	1
合计		0	0	0	1	0	0	1
总合计		39	60	137	88	132	11	467

三、研究结论

(一) 权威工具和学习工具应用过溢, 其中“管制”“要求”“信息发布”运用尤为频繁

据频数统计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涉及的政策工具大部分是权威工具和学习工具, 各占到 29.3%和 28.3%, 而权威工具中的“管制”“要求”各占 9.6%、18.4%, 学习工具中的信息发布工具占到 25.6%。而且进一步研究发现, 大部分“管制”“要求”类工具经常与信息发布工具联合使用, 可以看出, 信息发布工具主要用于管制与要求的相关具体事项的告知。如 2002 年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高等

学校学历证书规范管理的通知》告知了学历证书规范管理的基本原则及有关工作的基本要求, 并要求严格按照本通知所规范的内容和要求填写、颁发毕业(结业)证书; 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监督与管理。2014 年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 公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共 10 大类 50 条), 并提出要求: 确保信息真实及时、建立即时公开制度、完善年度报告制度、构建统一公开平台、加强公开监督检查, 并进一步要求做好清单的落实工作等。可见, 虽然我国自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深化改革,扩大自主权的若干意见》、1996年《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深化改革扩大自主权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对高等学校自主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从法律上确定了高校自主权,并在以后的相关政策文件与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把落实高等学校自主权作为开展各项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仍以国家意志为转移,作为具体的高等教育承载体——高校来说,所拥有的自治权仅是如何执行好国家意志的自主权,相当一部分高校对于如何办好高等教育没有体现出相应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其关注的重点或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把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事项做好,而对于如何把人才培养好、如何把教育办好则缺乏自己的理念和前瞻性,这也是我国高校趋同、缺乏特色的原因所在。

(二)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中自愿性工具应用相对不足,能力建设工具过度集中于科学研究领域

自愿性工具强调社会自治,各社会主体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管理,解决社会问题,其重心是市场工具。在高等教育领域采用自愿性工具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给高等学校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从而激发他们的活力,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形成自己的特色,促成管理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增强办学的主动性。对本研究所收集的政策文本进行统计发现,自愿性工具的使用相对不足,仅占2.4%,而且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参与,所统计的自愿性工具总数只有11项,但是有7项用到的是社会参与,而且更多偏向的是对社会资金的引进。例如,2001年科技部、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印发〈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对重点任务的罗列,其中有“(二)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完善产权激励和利益分配机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管理机制;(三)拓展融资方式、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等,这与自愿性工具使用的核心意图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另外,对于能力建设工具来说,使用较多的领域在科研领域,其主要目的在于推动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基础学科的发展。如《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若干意见》《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等,而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领域则相对较为薄弱。能力建设工具就是政府投资于物质、智力和人力资源,以提高个体或机构执行政策的能力,它着眼于个体、群体或机构实现其功能的长期效力,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投资行为。能力建设工具中制度建设事项使用较少,大多通过添置设备、经济支持、培训员工、增设机构等事项以提高政策执行主体或机构的能力,这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策略,同时也为高校或个人提供了一种获取资源尤其是经济利益的渠道。如果在科研领域过多使用这类能力建设工具,而在人才培养或社会服务领域使用较少,许多高校就会呈现“重科研,轻教学”“重视学术研究,忽视教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其结果是国家与相关社会组织对大学的评估主要看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科研经费等硬指标,高等学校关于教师的职称评定、评奖评优、绩效工资认定等主要看其科研成果、学术论文、科研经费等,而教学方面的要求则相对偏低。正是这种“重科研,轻教学”的错误导向,动摇了部分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地位以及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影响了大学管理者的决策以及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三)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使用的重心领域还是在学校管理,尤以招生、学生管理和财务管理为主

通过统计发现,在学校管理领域,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都很高,总量上占54.0%,而又主要集中在招生、学生管理和财务管理,分别占学校管理领域的13.9%、16.3%、16.3%。这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高校的具体事务插手过多。从所统计的政策文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政策涉及的学校管理领域,大到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小到食堂管理、校园安全,无所不包。二是相对于关注高等教育的本质使命来说,政府似乎更关注教育资源的使用与教育秩序的维护。由于我国大学是在政府主导下创立的,无论是政府、社会民众还是大学本

身在思想层面都默认政府应该掌握大学的发展，这也导致其在根源上就不具备自主性。高校是国家的下属机构，为维护良好的符合国家意志的教育秩序，政府掌管着高校的人事任免权，掌握着高校大小事务的管理权，掌控着高校内外资源的配置权，还严格限定了高校的评估标准，而高校必须接受国家直接的行政指令式管理。另外，我国政府是高校的主要资源提供者，来自政府的拨款在高校总经费中占较大比例，这对高校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为保障这些资源的合理使用，政府非常重视对经费使用的监管，对各项经费的使用严格限定。政府对高校经费使用方式的过度干预，弱化了高校自主行动的能力和积极性，也降低了资源的使用效率。

（四）政策数量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紧密联系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主要是两件，一是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二是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通过前面关于政策年度的统计发现，高等教育政策文本数量的起伏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在我国已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任务后，政策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回落，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外部性影响的凸现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要求，政策文本数量又有所回升。由于各高校的章程也是教育部正式颁布的政策文本，2013 年发布了 6 所高校的章程，2014 年发布了 41 所高校的章程。但本研究挑选样本的原则是具有全面影响力的，所以因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导致政策文本数量回升的趋势在统计图表中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从总体趋势来看，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重大战略的背景下，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将是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趋势，为此，高等教育政策文本数量仍会出现减少的现象。

四、政策建议

（一）政策制定应注重长远目标和宏观目标，适当结合短期效益

政策目标是政策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项政策的核心。它是设计政策方案的依据、政策执行的归宿和政策评价的标准。细观本研究所统计的 1994 年至 2014 年之间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政策

目标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推动某一项项目的开展，如《关于做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支教工作的通知》《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关于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等；二是针对当时社会某一突出社会问题的应对之策，比如教育质量、校园安全、招生腐败等，如 2000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治安保卫工作的通知》，这与高校各类案件频发有关。据统计，1999—2000 年，全国 76 所高校共发生各类案件 9278 起，非正常死亡 176 人；201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布前后，据相关报道，自主招生、破格补录和调换专业日益成为高招腐败的三大“重灾区”，高校自主招生领域腐败频发，官员因招生腐败落马并不鲜见。这些都显示出政策制定的即时性，缺乏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管理的长期思考。为此，政策制定应注重长远目标和宏观目标，适当结合短期效益。这既是我国教育部门进行职能转变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属性的要求。从职能转变来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要“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监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周川认为，政府在对高校的治理及管理职能上，不应该是在学校内部的动作过程或者是环节上，更不应在高校内部所需要办理的日常事务上，重点应该是在外部的宏观关系上，还有就是要放在高等教育事业的方向和质量标准上。为此，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对高校进行管理，应围绕高等教育的宏观目标与长远目标，而不要过多涉及高等学校内部的具体管理细节。从高等教育自身属性来说，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本质及其属性的问题上，总是从其外部寻找自身的规定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经济属性。作为社会现象，高等教育与政治和经济直接紧密关联，但如果因此将高等教育的本质归结为政治或经济，进而要求高等教育

依附于政治和经济，无疑等于取消了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美国教育家杜威就说，教育过程之外没有目的，教育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和本质，进一步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高等教育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特别强调，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为此，高等教育政策必须围绕培养人这一基本活动来发挥作用，失去了这一点，高等教育就不再是教育了。

（二）根据政策问题的属性和政策目的的均衡合理创新地使用各类工具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高等教育政策的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及其所应用领域存在不均衡的现象。相对来说，权威工具使用过多，能力建设工具和激励工具过多运用于科学研究领域。各政策工具都有优缺点，其作用也不尽相同，如权威工具较容易实施和管理，成本较低，效果具有直接性且更易见效，但又容易扭曲自愿性或私人活动，过于刻板而缺乏灵活性、不利于革新和技术进步等。能力建设工具与激励工具易于确立并加以实施，能够鼓励创新，是一种灵活的工具，但是能否达成所希望的目的也是较难以衡量的，而且如果过多过滥使用也会导致失效。因此，在选择政策工具时须根据政策问题的属性和政策目的的合理地进行选择。同时，政策工具的使用不能单一化，而应综合使用，并积极地创造新工具。另外，尽可能在高等教育的不同领域均衡使用各类政策工具，以便促进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均衡发展，并适当向人才培养职能倾斜。

（三）积极引入自愿性工具，使政府对大学的

管理由“过程控制”转向“结果管理”

政府对大学的管理由“过程控制”转向“结果管理”，要求政府不再干涉大学内部具体的运行和微观管理方式，而是通过制定目标、规则以及战略方向等来引导管理对象的行为方向，从而激发大学的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3种形式：一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从广度和深度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使市场竞争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公共资源分配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公共预算拨款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高等学校的质量、绩效成为获取政府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二是在管理手段上引入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是指各级管理者和员工为了达到组织目标共同参与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绩效目标提升的持续循环过程，绩效管理的目的是持续提升个人、部门和组织的绩效。通过政府与高校共同制定绩效计划，把政府的政治理想与大学的价值诉求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实现政府的目标与意图，又充分调动大学的积极性。三是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大学治理。促进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大学治理，推动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与大学构建合作伙伴关系。

（李科利，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湖南湘潭 411105；梁丽芝，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南湘潭 411105）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8期）

中国留美大学生学业和文化适应性问题研究

——以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为例

董庆文 陈 迅

一、执行摘要

本研究建立在对正在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学习的 29 位中国学生的 5 组焦点访谈基础上。这些学生的共同特点是，在学习期间他们都感受或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学业和文化适应上的困难与挑战。运用“焦点小组访谈法”揭示了形成中国留学生学业和文化挑战的四大主要来源：学习方法的差异性；文化及社会的适应；自我管理与发展挑战；沟通技巧的缺乏。

本研究进行于 2014 年秋，研究结果为提出中国留学生克服在美学习和文化困难的建议提供了依据。建议如下：

1. 学习方法上的引导和适应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讲颇有价值。在太平洋大学学习期间，中国学生普遍认为，在学习的流程、学习的实践和学习的风格方面，中、美有着显著的文化差异。

2. 在中国留学生完成文化和社会适应的过程中，大学为此提供一套社会支持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一套社会支持系统应该包括中国留学生社团、导师计划和文化适应中心等内容。

3. 大多数经历压力或是焦虑的中国学生，其压力和焦虑来源于不同文化所形成的认知错位。中国学生与导师之间需要建构一种和谐的互相理解的认知和学习过程。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提高留学生的学习绩效。因此，作为中国学生的导师，需要意识到由文化差异给中国学生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4. 一些中国学生依靠翻译工具，例如电子词典等电脑软件来习得学术知识和文化，但这并不是最为有效的学习方法。嵌入课堂和社会活动之中的语言培训才能让中国学生学到真正有生命力的知识和文化。

5. 在“面子文化”（a shame culture）中成长的中国学生易于在“罪感文化”（a guilt culture）环境中丧失文化信号。在新的文化中，为中国学生开展一些沟通交往的培训有其必要性。学生们应该能以

更为轻松的心态与教授们进行交往，可以轻松地向老师提问，或者是有疑问时能拜访教授、虚心求教。

6. 中国学生应该积极融入并适应太平洋大学的学习环境，持续不断地向同学、老师以及所处环境学习。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这是中国学生在太平洋大学获得自我提升的关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37 人名单中的 29 位中国学生参加了焦点小组访谈。他们被分成了 5 组，分别在太平洋大学的传播系进行。这些本科生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其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得到了任课教授的关注，因而得以推荐参加本次研究。

（二）研究步骤

在收到 37 人的学生名单后，研究团队先后发出三封电子邮件以招募学生参加“中国学生学习需求评估研究项目”。为了顺利地实现招募，其中一封电子邮件是由太平洋大学 6 个系在 2014 年秋季担任这 37 位学生授课的老师发出的。最后的结果是，6 位学生回复了邮件，37 位中的 29 位学生参加了本次评估项目，占全体招募人员的 78%。

每一小组访谈均超过了一个小时，并由一位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主持。整个小组访谈遵循开展“焦点小组访谈研究”的标准步骤，包括：热身问题的提出；问题引入；问题转换；核心问题呈现；问题小结。研究者为每一位参与者提供了食物和饮料，以营造一种舒适放松的调研环境。

访谈中，研究者向参与对象呈现了三大问题：一是在太平洋大学的学习过程中，你遇到了怎样的学习挑战？二是在太平洋大学的学习过程中，你面临的社会性压力是什么？三是在文化层面，你的困惑和挑战是什么？

（三）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建立在访谈主题的提取基础上，并采用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来解释和支持这些从访谈中

提取的主题。完成这一分析过程的具体步骤是：①阅读分析由访谈得来的所有转录记录，寻找主题；②识别学生中有显著共性的观点和陈述，并以此发展研究的主题和观点；③确定主题，并用根植于转录记录中的具体支持性证据印证研究观点和研究发现。

三、研究结果

经过对 5 个焦点小组访谈数据的收集，通过全面的数据分析，涌现出了一些突出的主题。形成学生学业挑战的四个来源得以识别，它们是：学习方法的转换；文化和社会适应问题；自我发展；挟裹着语言障碍的沟通技巧。

（一）学习方法

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建立在以老师为中心，以教材为基础，以考试为驱动的模式上。这与太平洋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小班化教学有明显的差异。访谈数据显示，很多中国学生对于如何阅读学习资料，如何有效地做笔记，如何准备考试表示困惑，对如何选择合理相关性的课程也表示迷茫。

1. 学业准备。根据学生们的讨论，许多学生不知该如何有效地使用学习资料开展学习。来美留学前，这些学生倾向于在课程老师的具体指导下进行学习。课程老师会告诉他们需要记忆某一章节的某一段，然后他们就会去重点学习，这不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模式。但是，在太平洋大学，很多学生不得不适应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学习模式。一位一年级新生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我愿意去记忆老师要求我们记忆的材料。没有老师的指导，我不知道怎样从大量的阅读材料中找到那些关键性的内容。”

自由地选修课程显示了高等教育系统中“主动学习模式”的特点。如何合理地在大学一年级选择合适的课程反映了某种学业准备的程度。在访谈中，没有迹象显示，这些学生对于选课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一位学生解释了成绩不好与“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安排有关，“我应该先学微观经济学，因为微观经济学可以为我学习宏观经济打下一个基础。”另一位学生补充到：“我们确实要仔细地安排课程，我们甚至需要去了解上课老师，因为他们的要求和风格都不一样。”

2. 学习冲突。来美学习之前，学生们倾向于在老师指导下的被动学习，而老师在教材的框架下进行指导。一位学生评论到：“我在中国学习，很容易就能在教材上找到老师上课的内容。可是这里的老师，他们在课堂上说的内容和教材上是不一样的。他们经常有自己的观点，这样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去抓学习的重点。”另一位学生自问到：“课堂学习我比较轻松，甚至作业我也可以轻松地完成，但是考试却很难。我也不知道原因。”

上述学生的访谈记录显现了中国学生的“学习冲突”。相较于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中国学生在留学期间会经历的文化冲突，“学习冲突”是一个还未被充分研究的领域。“学习冲突”是指，当学生置身在一种不熟悉的学习模式和教学模式中，学生被未知和混乱所袭击，被混沌和冲突所包围，学生承受着明显的挫折、困惑和焦虑。美国大学灵活、自主，强调“个性”的教学设计无疑给中国学生带来了挑战。

3. 重视“习题”和复习技巧。在中国，做大量的习题是一种学习的策略，中国学生习惯于完成大量的习题。一些学生认为，做习题是应对期末考试的最好方法。他们精于寻找绝对和唯一的正确答案，而这些答案也能在教材中找到。一位学生对参加“焦点小组访谈”表现了积极的态度，她用中文准备了要表达的一些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我希望老师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回家作业。做更多的回家作业可以帮助我复习知识，也可以显示出考试的范围。”

同时，中国学生知晓美国考试成绩的重要性，但他们希望美国教授能够给予他们考前辅导，可以给他们具体的复习内容，就像他们在中国学习时接收到的“考试导航”那样。一位学生谈到：“我希望导师可以告诉我，我应该复习什么，我应该如何去准备考试。”另一位学生回应到：“美国导师是不会为考试提供具体的复习内容的。”可见，中国学生希望寻求应对考试的捷径，并希望老师提供具体的复习技巧。

一份关于“中国大学生对好老师的认知”的研究指出，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大学生在优秀老师的认知上存在着差异。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对老师在可接近性、自信、热情、知识面、有效的

沟通技能、良好的倾听技能等方面的重要性都不如美国学生显著。但是，唯有在教师技术能力的重要性上，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显著。与日本学生相比，中国学生认为教师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受人尊敬的程度比较重要，而学习目标的设定，课堂气氛的调动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程度则不如日本学生显著。要求更多的回家作业，希望教授更系统的复习技巧，反映了中国学生所熟悉的学习技术。他们也向授课老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文化和社会适应的挑战

中国学生的教育环境受到“儒文化”的浸染，老师是班级的家长，学生需要体现尊重与好学，而不是互动。访谈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在适应美国的“侵略性文化”和社会环境中需要更多地褪去“儒文化”的影响，更为积极主动地表现自己。同时，中国学生需要理解美国社会崇尚个体的制度规则，例如预约制度。

1. 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在中国，每一个学生都隶属于一个班级。班主任对班级和学生负责，组织班级活动，并对学生进行生活学习的指导。学生需要听从班主任的指导，一些重要的信息将由班主任或是班长发布。一位学生分享到：“我们以前习惯了等待，等待着别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是在美国，他们尊重的是个人主义。我们应该靠自己去发现。当你在国外学习，你不得不锻炼你自己，不要觉得害羞，也不要骄傲。”

上述学生的讨论反映了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之间的碰撞。在集体主义中，以“听从他人的建议，寻求和谐的气氛、避免冲突”为指针；而在个人主义中，以“竞争、独特、负责”为指标。中国学生需要意识到两种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处事规则和思维模式，为理解不同文化下的行为模式提供思考的方向。

此外，一种不理解美国预约系统的焦虑情绪也在焦点小组访谈中涌现出来。这种不理解和中国学生缺乏对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的感知有关。一位新生指出：“作为一名国际留学生，我不知道，也不理解这里的预约系统。预约真的很麻烦。等你预约到了，很多事情都已经耽搁了。”

2. 对美国文化了解的缺乏。浸润在美国新的文

化背景下，中国留学生感到，他们对美国仍是知之甚少。由于在美国文化背景知识上的缺乏，他们无法和班级同学进行深入交流。如一位学生讲述了他与一位美国朋友交往的故事：“我试图找一些有趣的主题和他交谈，但是当美国朋友和我谈起一部在很久以前放映的美国电影时，我知道，我们的谈话结束了。”

另一位一年级新生意识到：“虽然我通过了托福考试，但那远远不够。托福成绩并不能帮助我解决在这里遇到的所有问题。我必须对这里了解得更多一些。”“是的，这里的文化是不一样的。美国同学讨论电影，但我不知道那部电影。或许我也在中国看过，但我没看过英文版的，所以也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另一位学生补充到。

3. 对安全问题的担心。许多学生对新环境中的安全问题表示担心。他们需要权威的安全建议。一位学生的观点是：“我需要在这座城市有更多的了解，有人需要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是我们不应该去的。”

一位学生甚至也对校园内的安全问题感到忧虑。“我寝室里的鞋子居然也不见了。”他摇了摇头沮丧地说。一位已经在美国高中学习了三年的新生也表达了一种不舒服的情绪：“我喜欢这个学校。但是我对这个州感觉不好。加州和我以前生活过的州不一样，我想，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斯托克顿太危险了。”

中国学生对美国社会和校园安全问题的担忧，与美国的持枪制度有关。个体可以持有枪械，这在中国学生看来非常新鲜而不可思议。而美国及中国各大媒体报导的校园枪击事件，也使中国学生深感恐惧。

（三）自我发展

美国的大学教育，在成人教育的范畴之内。美国成人教育具有教育者充分考虑学生需求和特点的原则，并在课程的设计、教授和评估中体现这一原则。成人教育的原则下隐含着这么一个前提，即受教育者是“成熟的人”。尽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成熟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成人教育中的“成熟人”则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具备自我导向、乐于学习、生活经验丰富、渴求知识的运用和具有内

在学习动力的人。自我的成熟是适应大学学习和生活的关键。

1. 自我导向。研究人员设计了了解焦点小组访谈人员自我学习导向的问题。当被问及“你为什么选择在这里读书？你的学习目标是什么？”时，几乎没有学生可以给予即时的回答。他们陷入了沉默，并进入到一种思考的状态，直到一位学生开口打破了这种僵局：“有时，我觉得自己迷失了自己。”

一些学习商科的学生希望可以将未来的职业定位在商业领域。但是，他们还无法清楚地表达更具体实际的职业计划，也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去实现梦想。一位在访谈中习惯于沉默的学生最后说到：“也许我的秘书会为我做所有的事的。”

和一年级新生相比，二年级学生对未来的蓝图构想更为清晰一些。一位学生说到：“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我知道下个学期的课程会更难，所以我准备暑假回中国的时候好好地准备一下。”

焦点小组访谈中，有关“自我学习导向”的讨论异常沉闷，绝大部分学生都不能清晰地表明自己的学习目的、目标和对未来职业的规划。这说明，中国学生的自我导向出现了严重的缺失，他们陷入了某种迷茫。

2. 资源的使用和获取。在集体主义的文化氛围中，中国学生似乎更习惯于等待指导和帮助。一位学生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的学生宿舍助理问我喜欢哪种运动。我告诉他我喜欢篮球。他说，他会找一位美国同学和我一起打。可是我等了很久，那个人却没有来。”另一位二年级学生回应到：“为什么你不自己去打？篮球馆就在那儿。你可以自己去找美国同学。如果你真的很擅长打球，你在这儿很容易交朋友。美国人崇拜英雄。”

经过一年的适应，二年级的学生显示了融入美国社会更为积极的态度。学生们都承认，克服害怕和面子问题，迈出第一步是最关键的。一位学生描述到：“第一个学期，我不知道该如何和课程老师打交道。我想靠自己解决所有的学习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我可能需要花 10 个小时。但是，当我去寻求课程老师的帮助后，他仅用了 10 分钟就帮助我解决了疑惑。现在，我更喜欢使用这些资源来提高我的学习效率。”

在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的转变过程中，自我学习能力的提升包括了学生寻求更有效的外部资源的能力。中国学生必须意识到，知识的获得绝不仅仅在课堂，网络资源、图书馆资源、朋辈的讨论、相关性的社会活动与实践等都是获得知识、提升能力的渠道。

3. 时间管理。访谈中，时间管理的有效程度也被提及。一位新生喃喃到：“我的上课时间很早。有时，我实在起不来，所以我就缺课。”另一位二年级的学生也经历过相似的情形，他说：“有时候，我不能管理好时间。但是坦率地说，我是觉得自己有点儿懒。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如果用上述 Knowles 对“成熟人”的定义，在学习过程中，具备自我导向、乐于学习、生活经验丰富、渴求知识的运用和具有内在学习动力的人。那么这些无法进行时间管理的学生，实在是难以符合“成熟”的标准。还记得那位想当医生的学生吗？当他被问及为什么他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职业发展目标并知道该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时，他解释到：“我的第一年学习很难熬，我想我获得了某种经验。那时，我也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和规划时间。”

（四）沟通技术的发展

英语作为中国学生的第二语言，他们需要时间，获得某种机会来真正实践和提高语言运用的能力。“像托福之类的考试成绩真的不能说明你已经拥有了好的语言技巧。”一位学生谈到。高超的语言能力不能和考试高分划等号。语言的运用能力，尤其是学术语言的应用技巧成为中国学生急需补充的“养料”。同时，中国学生还需要学习基本的人际沟通技巧，以利于他们能更为轻松地与美国人打交道。

1. 学术语言。一位商学院的学生认为，她最大的学习挑战是学术词汇。“有些经济学的术语，我是不理解的。在上课的时候，我不得不用我的电脑来翻译这些术语。这非常的花时间，而且让我不能专心听讲。”这个表述得到了小组成员的共鸣。“我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阅读材料。数学题并不难，但是我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读懂题目。”另一位学生

回应到。

一些对英语词汇掌握较好的学生也面临着语言的障碍。“我知道每一个单词的含义，但是当它们组成一个长的句子，我就不能有把握地理解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自己需要用英语的思维来想问题，这样应该可以提高我的理解能力。”

2. 沟通技巧。中国留学生希望也需要能在校园内外与社会实现良好的互动与沟通，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那把可以实现自如地进行社会交往的钥匙。一些学生反映说：“有些人会认为，中国学生总喜欢和中国学生聚在一起玩和学习，那是因为我们觉得比较舒服。我也想融合进美国的社会，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也有美国朋友。但是他们认为，如何想与美国人建立更深或更为亲密一些的小伙伴关系的话，就会很难。“我的室友很好。我们互相之间也聊天，但都是一些简单的小的谈话。”

“我也有美国朋友，但是我们不能长时间的聊天。”

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学生在进行社会交往的时候，会敏感地捕捉交往对象的反馈。一个学生陈述到：“当我感觉到他们不喜欢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感觉很难过，然后我就再也不想和他们说话了。”另一位在美国读了三年高中的学生也说：“当我感觉到有些人并不友好的时候，我就会停止和他们接触。”

四、建议

根据访谈结果，此研究力图提出一些建议，以帮助中国留学生能更好地克服来自于学业、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挑战。

（一）学业指导

鉴于中、美之间存在的学习模式上的差异，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留学学业指导是必要的。学业目标的设定、学习兴趣的激发以及主动学习模式的构建需要在学业指导中体现。对于一年级的新生，合理的选课技巧与指导也是必要的。

（二）社会支持系统

大学需要对留学生设计构造一套社会支持系统。一个“聪明”的支持系统将会是“三赢”的模

式。良好的互动沟通不仅使参与方受益，社会本身也将受益。留学生一方面从新的社区环境中得到某种帮助，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社区贡献多样性和文化的互动。这种社会支持系统的目标是加强不同文化间群体的理解。

（三）学业导师

大多数的中国学生在第一年的学习中感受到了压力和焦虑。文化和社会的适应，心理方面的调试是无法避免的。来自于专家的鼓励和建议可以帮助他们缓解压力和焦虑。自信往往是实现自我发展的最好动力。大学职员和导师需要了解和理解这些中国学生所面临的挑战和不足。

（四）学术语言的培训

学术语言在学术领域具有特定的含义。解释学术语言背后的知识背景，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特定的知识。对于英语是第二外语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花更多的时间对于学术词汇和关键性的学生概念进行针对性的学习是非常关键的。

（五）美式沟通技巧的习得

口语的表达对于沟通来说至关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工具。良好的沟通需要在口语表达中嵌入多种元素，才能帮助人们互相理解。同时，非有声语言在不同文化间也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善意的微笑，积极的生活态度，谦卑的姿态都能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这些综合性沟通元素的良好体现会对口头语言的进步带来益处。

（六）异国文化的适应

对美国文化，尤其是历史知识和宗教传统的知识了解，可以帮助留学生理解新的社区。寻找一些有趣的主题，例如音乐、体育、卡通、食物、时尚、约会等，就这些主题增加留学生对新文化的了解程度，可以在留学生中植入新的文化基因。

（董庆文，河北大学特聘教授，美国太平洋大学传媒系主任、教授，美国加州斯托克顿 95211；陈迅，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9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7期）